

一九三五年世界概況叢書

# 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動態

林孟工編著

王雲五 韋懋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錄

導言.....一

第一章 一九三五年的政治與社會.....五

第一節 法西斯主義勢力發展與社會.....五

第二節 擁護民主主義運動與社會.....一六

第二章 一九三五年的經濟與社會.....二二

第一節 一九三五年的不景氣與社會.....二五

第二節 軍需工業發展與社會.....三三

第三節 一九三五年的財政與社會……………四一

第三章 一九三五年的勞動……………五三

第一節 一九三五年的勞動者生活……………五三

第二節 一九三五年的勞動運動……………七〇

第四章 一九三五年的婦女……………七八

第一節 一九三五年的婦女政治權利……………八〇

第二節 一九三五年的婦女經濟狀況……………八六

第五章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社會……………九二

第一節 德謨克拉斯西傾向下的蘇聯社會……………九二

第二節 經濟發展下的蘇聯社會……………一〇〇

(一) 蘇聯的計劃經濟與社會·····	一〇〇
(二)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經濟發展與社會·····	一〇五
第三節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勞動狀況·····	一〇九
(一) 一九三五年蘇聯勞動者的生活狀況·····	一一九
(二) 一九三五年蘇聯勞動生產力的發展·····	一二三
(三) 斯泰哈諾夫運動·····	一二五
第四節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婦女狀況·····	一一八
(一) 蘇聯婦女地位之演進·····	一二八
(二)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婦女問題·····	一二〇
結論·····	一二六

# 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動態

## 導言

在一九三五年七月號的美國外交評論裏面，有着英國文豪威爾斯 (H. G. Wells) 「文明的危機」一篇論文。作者於臆舉世界各強國青年失業的現象後，感慨人類剩餘的精力之無法利用，勢必爆發為蔓延全世界而燬滅全人類文明的第二次大戰，因為，在他看去，戰爭恰如人類社會的一種排洩方法一樣，能夠消滅人類所不能利用的剩餘精力。他的結論大體是說：「眼前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如何維持永久的和平。假定和平是被戰爭所破裂了，原因即在於我們在現存的條件下，不能利用剩餘精力，不能解決失業問題。國際裏面合縱連橫的動作，絕不能消滅戰爭，因為人類剩餘精力的累積，卻不因合縱連橫的動作而中止。人類如要維持永久的和平，必須創造新的世

界。在新世界裏面，人類都以合理的和自由的精神，來從事集體的勞動，進而提高生活的標準，以求耗費剩餘的精力，使牠不至排洩於燬滅文明的戰爭裏面。」

上面那幾句話，是充分的披露了一九三五年世界社會的大危機。其中未嘗不有足耐人尋味的地方，即社會問題如果無法解決，社會生活無法調整，則終要爆發殘毀人類的戰爭，無論任何政治手段，都不能挽回這個狂瀾。

然而，在以弱肉強食為適者生存的手段之資本主義世界裏，各種社會問題，尤其是因人類精力無法利用而發生的失業問題，實為牠本身無可避免的矛盾。那些經濟學者們所崇奉的自由競爭的原則，事實上是無法避免不產生犧牲最大多數的人類以發展最少數支配層的利益的结果。在這種情形下，大家所稱為社會恐慌問題始終未能找到圓滿解決的途徑，且其嚴重性是一天比一天深刻。支配層之維護本身利益的手段，實際是隨着社會恐慌的高潮而愈演愈烈，調整整個社會生活的希望也更在虛無縹緲之中了。那麼，威爾斯所謂提高社會生活標準之創造新世界的方案，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過於幻想的改良政策，與現階段的趨勢是枘鑿不相入的了。牠的不可能性，

恰是如政治手段之不能消弭戰爭一樣。

那麼，在這個世界裏，迂迴曲折的維持和平的政治手段既根本無成效，改良社會生活條件的新方案又根本無從提出，結果只有走到毀滅人類的戰爭路上了。明白這個，則我們對於瀾漫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戰爭空氣，就不至懷着一種奇異的印象的確，一九三五年的世界社會，一面充滿着種種社會生活不調適的現象，另一面則開展着戰爭前夜種種威脅現社會運命的行動。

一九三五年就在這個机陞不安的局面中過去了，關心未來世界運命的人們，當然要留意於整個社會的狀況，則檢討一九三五年的過去社會變動，不能不說是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工作。

社會原是包羅萬象的，在這個篇幅極有限的研究裏，我們自然難於一一枚舉。我們就注意於一九三五年政治和經濟的變動所影響下的社會狀態，同時將構成社會問題最重要部份的勞動問題和婦女問題，也分別加以檢討。

最後，現階段的世界是分爲兩個壁壘：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這是舉世所公認的事實。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當然與社會主義世界的社會大相懸殊：因爲在敘述上我們不能將之混

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動態

在一起，所以另闢一章，專講蘇聯社會的狀況。



## 第一章 一九三五年的政治與社會

### 第一節 法西主義勢力發展與社會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大戰後的資本主義世界，在社會危機日見深刻的威脅下，曾經廣泛的施行改良政策的嘗試，以期解除牠內在的矛盾。但是，那些改良政策始終不曾緩和了資本主義內在的危機，而社會糾紛仍舊層出不窮，處處動搖了現社會的基礎。因為戰後的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濟上是表現了高度發達的形態，完全受了金融資本的支配，而在這個高度化的階段裏，下層的反抗運動日見活躍，他的勢力又因中產階層之日趨貧乏而大見擴展，在這時候，支配層如要維持其已陷動搖的基礎，則不能不迫切要求強化牠的政治權力，以與不滿現狀的份子相周旋。加之，資本主義於無法消滅其本身致命傷的矛盾的時候，就在戰爭的冒險行為上求出路，因此也有強化

其寡頭政治支配權的必要。

法西主義的勢力，就在資本主義需要強化牠的支配權的過程中，而一躍登上政治舞臺了。在一八四八年一月的革命中，進步的社會學者，於論到德意志布爾喬亞恐懼勞動大眾而將如何的緊張化時，曾經說道：「在這樣情形之下，布爾喬亞的支配必然的不得不轉向於獨裁化。」

法西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政權高度獨裁化的表現。資本家所希望的，是保持他們在國家財富上優越的地位，及保證他們繼續不斷的獲得利益。所以，以資本團體爲其財政支撐的法西主義，不但極力反對用非常手段使財富社會化的社會主義，同時也反對無力統制資本家之敵人的民主主義。在牠看去，國家的力量和軍隊就是用爲保護上層的財富及利益的。至於民主主義所崇奉的議會政治，民權，及言論出版自由等等，都是法西主義所認爲不可假借的權力，而與以一筆勾銷。在政治上法西主義所採取的手段，當然也不能如民主主義所採取的那麼溫和，卻純粹的傾向於「暴力」正如墨索里尼所說：「用暴力解決社會上的毒瘤，是最主要的，最高尙的，最必需的。」因此，民主主義治下所還可容許的罷工，怠工，工會活動那一類的事件，法西主義是絕對不許可的；社

會上各種運動，法西主義必以極端威力來鎮壓的。在絕對信仰威力之中，法西主義對內則推動一種偏見的刺激，引起人民對某一個種族或某一個自由團體的仇恨及不能容忍的心理，甚至釀成了人類最殘酷的慘劇；對外則篤信黷武主義，尤其是鼓吹開拓領土，侵略殖民地，以應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所必需之原料品的供給與製造品及資本的暢流。

法西主義既是應資本主義的需要而產生，牠的最大使命，無疑是壓制資本主義機構死命的國內左翼運動。但牠的誕生或發展的時期，恰是在恐慌局面惡化，農工業凋敝，中下社會階層極受失業狂潮所襲擊的環境裏。在這個不安的空氣中，左翼運動勢將昂揚起來，而法西主義便不得不順應這個潮流，標榜了反對受壓迫的中下社會階層所敵視的少數資產者，以求牠本身運動的擴展。所以，法西主義一面固然摧毀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運動的勢力，另一面則猛烈抨擊充當資本主義骨幹的大資本家。例如德國國社黨，在他們的二十五條綱領裏，曾用極其熱烈的口吻，主張把托辣斯收為國有，將大百貨店收為公有而分配與小商人，無償沒收土地以適應公共利益的需要，沒收因戰爭而致富者的財產，殺戮高利貸者及投機者等等，同時他們也表示關心勞動大眾的

生活，要求國家以保證公民的工作及其生存方法爲要務。日本法西斯蒂當初所揭發的綱領，爲覆滅爲資本主義所御用的亡國議會政治，及確定產業大權以期打倒資本主義；在那時候，日本法西斯主義所鼓吹的「產業奉還論」，「皇道經濟論」，「產業大權確立論」等等，無一不是以推翻資本團體的支配權爲目的。依照當初的情形，法西斯主義顯然引用了社會主義的政策，表現了實行財富社會化的傾向，在某時期中甚至於賺得了左翼團體的招牌。當中下階層陷於飢寒交迫的窮困境遇中，法西斯主義反資本家的宣傳，必然也引動窮困大眾的同情，而取得一般左翼勢力的地位。同時牠又配合上了各種愛國主義的口號，開闢新出路的誘惑；這些推陳出新的號召，實使溫情的左翼運動，對之有望塵莫及之感。因此，由分削左翼運動勢力的結果，實現了法西斯主義勢力勃興的勝利。

到法西斯主義勢力壓倒了左翼運動的時候，或在牠表現了橫壓左翼運動勢力的時候，資本家惶惶不安寢席的致命危機，就因法西斯主義的發展而有得到最後挽救之可能的希望。在這時候，德謨克拉西爲廢物，且反爲左翼運動所利用的資本家，要想在他們政治機能上改絃更張，則現成

的法西主義，就是他們最理想的犀利武器。至於以反資本家口號為幌子的法西主義，對於資本家的關係，根本就沒有絕對不可調和的因素，牠所痛心疾首的對象，恰是與資本家所敵視的一樣，同為破壞現社會秩序與進展的國際主義的「惡魔」。何況法西主義之企圖攫取德謨克拉西的政權，與肅清左翼運動的勢力，必需取得資本主義支配現社會的一切力量的扶助。在這些促使雙方互相接近的因素裏，從前反抗資本家勢力的法西主義，就在不自覺或半自覺的場合中，全部拋卻反資本主義的立場，而集中力量單純的加緊反左翼運動的行動：由與資本家妥協，進而受了資本家的擁護，終於成為資本家強化他們支配權的工具。從前那些推翻資本主義特殊份子勢力的計劃，現在一變而為鞏固這種勢力的「統制經濟」的呼聲，實際上就是進一步演成資本家獨佔局面的運動。在這時候，資本主義與法西主義兩位一體的關係之密切，無論在性質上或程度上，都遠在從前資本主義與德謨克拉西的結合之上了。

沒落的資本主義機構，拋棄了柔弱無能的德謨克拉西，而以摧鋒陷陣所向無前的法西主義做牠的護身符，必然可以加緊鎮壓反資本主義的運動，而以最大的威力來維持現社會的秩序。法

西主義並以實際的行動來標出牠的擁護資本主義利益的熱誠與採用暴力政策的決心。

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就在法西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合奏中，備嘗暴力政治的滋味。而且，在全世界受了這個影響之下，大家都有着武力是唯一可靠手段的感覺，因此到處只看到暴力政治的威脅。

下面就是一九三五年受這種暴力政治威脅下的社會現象。

暴力政治的第一個作用，無疑的是肅清動搖現社會的敵人們了。牠除了製定許多嚴厲的法規，根本取消勞動運動的產生條件外，又以有組織的暴力行動來鎮壓國內的反對派。白色恐怖籠罩之下，到處製造了無數的犧牲者。這種犧牲者數量之驚人，當然是整個社會不安狀態之象徵的實現。據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俄國真理報的統計，一九三四年上半年，五十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除外）內，因社會騷動或革命事故而打死的人數，共計二千九百五十七名，重傷者二萬四千七百七十名，輕傷者二萬零六百二十四名，被捕者十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九名。在同期中，政治審判案共有三千九百零三件，其中判處徒刑的人數，共計一萬四千零七十七名，判處無期徒刑

者八十九名，處極刑者九十四名。就個別的國家論，當然是受了法西主義暴力政治的統治下的那些國家，特別佔着「榮譽」的地位。德國在這半年中，打死者有六百六十七名，傷者有二萬五千零七十四名，被捕者有三萬零三百二十名；政治審判案有九百零九件，其中有四千二百四十六人判處有期徒刑，處死刑者有二十三人，處無期徒刑者有十一人。在日本，關於政治犯的死亡，當局並不公佈，亦不許報紙登載；所可稽考者，則在這半年內，被捕人數有三千九百八十七名，政治審判案有二十九件，判處有期徒刑者有七十九名。在奧國，打死者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重傷者有五千三百零九名，輕傷者有三千九百五十五名，監禁者有二千零六十三名；政治審判案有三百三十件，其中被判入獄者有一千二百三十一名，處死刑者有九名，無期徒刑者有十九名。在西班牙，打死者有六十名，傷者有二千三百三十二名，被捕者有三千三百四十七名；政治審判案有二百六十六件，判處有期徒刑者一千二百九十五名，處死刑者有六名，放逐至非洲殖民地者有三百零一名。在這種政治變動繼續闊步邁進的一九三五年中，不安社會的犧牲者的數目，較之一九三四年上半年，無疑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遭受這個暴力政治的壓迫者，其次則爲國內少數民族，德國的反猶太政策，就可爲這個趨勢的象徵。在一九三五年中，德國當局格外加緊其排猶運動。九月十五日所謂「保護日耳曼血統及尊嚴法」裏面，這有着這麼嚴酷排猶的規定：「禁止猶太人與德意志人及其血統相近的種族通婚。禁止猶太人與德國人發生性的關係，違者科以十年以下的監禁。凡猶太人與德國人故意規避法律而在國外結婚者，得取消其婚姻關係，並提出公訴，猶太人不得雇用未滿四十五歲之德國女僕。猶太人懸掛德國國旗或佩帶卍字徽章者，則處以一年以下的監禁。」在法西獨裁政治的統制下，像猶太人這樣的遭受政治、經濟、法律的壓迫，可謂是無微不至了。

卽號爲站在局外的宗教，也不能免於暴力政治的壓迫。在一九三五年中，德國國社黨政府，曾以種種嚴厲手段，取締牠所仇視的宗教團體的活動。在日本，則有大本教的檢舉事件，以爲點綴。大本教的教旨是主張「國家二元主權說」，卽主張皇權與教權並存，因使日本當局認爲動搖萬世一系的國家組織的基礎，而在是年十二月施以第二次檢舉，自教主王仁三郎以下，被捕者達三十人以上，並與以解散的處分。



上述種種，多半與現社會藉暴力政治來維持其基礎的作用有關係。然而，這與贊助資本主義闖出恐慌局面而發展其本身利益的企圖，仍然不能成爲有效力的作用。所以，暴力政治不能不另覓應付當前危機的途徑。

在成立極端暴力主義的法西政權的國家，或事實上已受這個勢力所支配的國家，法西式的社會政策，既不能消滅社會恐慌，且從而換來了社會的惡感，至所謂統制經濟種種花樣，歸結總是不能產生多大的作用。因此，不特法西勢力因此發生動搖，即挾法西主義以自衛的資本家，既不能解決他們當前的危機，又難於純以威力來鎮壓整個社會的蠢動，勢將使他們的機構全部瓦解了。然而，法西主義對於資本家的效勞，不僅在於替他們出面鎮壓國內反抗運動，牠的作用，同時也在於恐慌襲擊中替他們闖開一條出路。這條出路非它，就是到戰爭之路。是的，對着戰爭這個問題，名目上無論其爲積極的準備侵略戰也好，或爲消極的充實國防也好，第一個結果就是讓那些大資本家支配下的各種產業，特別是直接或間接與軍需有關的工業，立可運用牠們的生產能力，立可使那些資本家轉到繁榮之路，賺了蕭條時代無法可賺的利潤。假定戰爭的目標是爲開拓疆土，則

在擴展殖民地的市場下，原料品的供給與製造品的暢銷，都可得到保證，而與有資本可經營的人們以無疆之麻了。而且，在戰爭空氣籠罩之下，宣揚國威的愛國主義，與滿足資本主義社會需要的侵略主義，至少總可移轉一部分不滿意現狀的份子的視聽，同時對於增加國內民衆負擔的行爲，與不能解決社會困苦的原因，都有詞解釋了。所以，在法西斯主義活躍之一九三五年，戰爭空氣瀰漫着全世界，而戰爭的威脅也就是發自最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德國、意大利及事實上受法西斯勢力支配的日本。依次列舉，則德國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宣佈正式成立空軍，十六日宣佈恢復強迫軍役制，因而在歐洲出現了以侵略爲目的之新的法西斯主義武裝；意大利自從五月起陸續派遣大軍侵略阿比西尼亞，十月三日正式宣佈對阿開戰；日本自從六月起積極壓迫華北，十一月策動河北漢奸宣佈自治，製成「冀東防共自治會」的傀儡政府，繼而侵擾察東各縣，另一方面又與蘇聯不斷的發生邊境衝突，這些事件，無一不產生了鼓動世界戰爭的作用。

然而，以黷武政策爲鼓動愛國情緒的麻醉手段，果然可以挽救現社會的危機嗎？我們如若確信戰爭行爲是促使社會條件瓦解，則對於法西政權的前途，以及整個現社會的前途，不難得到明

確的認識。同樣處在大戰爆發的前夜，一九三五年較之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期，卻有一種顯然不同的特徵。在上次大戰前，除俄國之外，各國革命運動，是不甚引人注意的。一九三五年則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醞釀深刻化的開始時候，如罷工、反抗、示威、巷戰、流血種種現象，是洶湧澎湃的表現出來；就在受法西勢力所左右的日本，工、農以及智識份子之被逮捕、被檢舉的情事是層出不窮，即其賴以支持帝國主義的軍隊，也常有陷於「危險思想」的影響與行動中的事實。這種趨潮之擴展，非任何暴力政治所能阻壓，也非任何鼓動戰爭的政策所可轉移。反過來說，這種趨潮未必不是暴力威脅與戰爭政策所加速促成的結果。

在一百六十年前，盧梭已曾說道：「一個政治組織，將權力付托於少數人，沒有不造成寡頭政治以私人安樂混為公共幸福的結果，沒有不因其無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而激動了革命。」到了一九三五年，這個原則仍保留着牠的正確性。暴力的獨裁政權，非但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且而進一步使現社會破綻百出，牠之激動革命的力量，必然遠在百六十年前的情況之上了。這可由下節所述的事實，充分與以證明。

## 第二節 擁護民主主義運動與社會

在一九三五年反法西斯運動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特徵，即大部份中下階層之擁護德謨克拉西，以壓制法西斯勢力之進展。極端的左翼政黨，期於策略上的作用，也願意同改良主義的溫情派聯合起來，協力抵抗共同的敵人。這在社會革命運動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特殊的現象。

我們如要明瞭這個傾向的原因，則先應注意現階段社會所受到政治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產階級爲反對封建勢力的專制政治，力求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由是德謨克拉西政體應運而生。以牠的本質論，德謨克拉西原與資本主義同時誕生同時培養的。資本主義勢力發展後，德謨克拉西所標榜的政治上平等，則因經濟上不平等而失效，而終於做了資本主義的假面具，製出了極端不平等的社會。但到了社會生活與經濟機構完全矛盾的時候，德謨克拉西對於社會各種糾紛問題，既不能爲資本主義盡其控制的力量，而又不能爲窮困大眾施行澈底的政策。到這時候，德謨克拉西是成爲雙方不討好的制度了。

不過，德謨克拉西與法西主義，雖則兩種制度同為資本主義的御用物，但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則在程度上不無顯明的差異。那些熱心擁護民主主義的人們，尤其是站在民主主義左翼的人們，雖則不悟於現階段經濟的發展已與社會生活發生了不能消泯的矛盾，但他們總希望由普及選舉，普及教育，增加物質生產，以提高一般生活標準，並以推行社會改良政策，來求解決社會的矛盾。平心而言，在某種意義上，民主主義比較的着重於服從人民的公判，牠所求於社會的，比較其他政體的多，而牠所貢獻於社會的，也應當比較多些，牠之增進社會福祉的志願，也應當比較堅強些。牠固然做了資本主義的傀儡，但未到圖窮匕現的時候，牠還想維持牠的空殼，還想把社會問題放在心頭。尤其重要者，是在民主主義治下，社會革命運動尚有着着醞釀之餘地。所以，我們在資本主義宰制世界的過程中，過去還可以看到社會改良政策的實行，如社會保險，勞動立法各種設施之逐步演進，罷工、組織工會各種行為之被承認；整個社會儘管是在資本主義的宰制中，仍可看到簇新東西的產生，尤其是勞工運動得公開的繼續進展。

到了法西主義擡望，上述種種都一一被推翻了。從整個社會上說，法西主義支配之下，首先即

造出威脅世界和平的空氣，格外表現了暴力支配國內社會的特質。若就法西主義與勞動大眾的關係上說，則資本主義的真面目更是因之而畢露無遺。因為法西主義是反對勞動運動的；牠絲毫不與勞工以自由結合的權利，因使勞動大眾在眼前鬭爭中，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牠是與社會改良政策背道而馳的；牠只要維持現狀，不想使社會生活得到任何政策。總而言之，法西主義對於社會最大的影響，是以崇拜軍國主義，信仰暴力的萬能，以維持資本主義的絕對優勢。至於整個社會的命運，尤其是社會問題的前途，則在牠鼓動愛國情緒的麻醉手段下，不免都做了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的犧牲者。但是，法西政權雖則動員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力量以自防衛，以消滅不滿現狀份子的反抗行動，但在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政治社會上，我們仍在下面看到法西主義的高壓政策的反響。

當法西主義在有些國家裏爭取政權成功後，其它國家的不滿民主主義的份子，先後起來響應，法西運動的狂潮一時幾乎瀰漫於整個世界。特別引人注目者，是歷來崇奉民主主義的法國，也有包括八十多萬人的多種法西主義團體之產生。那些「火十字團」，「佛蘭西斯姆」等等，羣起

舉行示威運動，猛烈抨擊議會政治，尤其是從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的流血慘劇以後，杜美格的國民內閣已經變相的破除議會政治的慣例。在民主主義最後壁壘之法國表示動搖的時候，世界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氣燄是益發不可當。譬如，在那一年，牠的勢力也在西班牙國內着着進展：那時西班牙內閣迭次改組，事實上是逐步走到法西斯化的路上。依照這個趨勢，似乎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將普遍的墜入法西斯主義的懷中了。然而，實際情形又不盡然。一般左翼運動，經過德國國社黨的嚴重教訓後，深感有調整鬭爭營壘以應付法西斯勢力的襲擊之必要，由是擁護德謨克拉西的運動迅速的擴大。當初對法西斯主義表示同情的一部份的羣衆，現在爲維護他們本身的利害，就竭力贊助反法西斯主義的運動。站在極端左翼的人們，也不能不應策略上需要而積極加入。即以素來關在象牙之塔裏的知識份子，也以維護人民權利和自由的目標，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專政，其中尤可注意者，即是知識份子反法西斯的行動，曾有與勞動大衆密切合作的表現。

一九三五年就是資本主義世界反法西斯運動演得有聲有色的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們已經看到既成的法西斯政權流露了牠的破綻，和在野的法西運動受了嚴重的打擊。先以德國而論，在流血

統治的高壓政策下，我們雖沒有看到怎樣大規模的反國社黨運動，但因德國國內經濟上的困難，社會狀況惡化，民衆不滿情緒的激增，首先進一步演出國社黨內部互相傾軋的情事：如引導希特勒入國社黨及起草國社黨二十五條綱領的費德（Gottfried Feder）之被撤職迫退，與當初充任國社黨軍重要領袖的布魯克勒（Bruckner）之被逮捕，以及一九三五年初所流行的國防軍反對現制度及衝鋒隊不穩的消息，在在表現了國社黨統治的暗礁，在七月二十日，國社黨又須來一套肅清反對派的舉動，益見當時局勢之緊張。在其它國家裏，反法西情緒最熱烈者當推法國。其屬於政黨方面的行動者，則如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法國四十八個政治集團聯合發表宣言，擁護德謨克拉西，反對法西主義。十一月三日，法國新社會黨，法蘭西社會黨及社會共和黨聯合成立了「共和社會主義聯合會」，以反對法西主義爲宗旨。法國政府也因左派政黨的督促，頒佈了若干限制法西運動的設施，如十月二十二日頒佈新令，取締政治活動，十二月五日政府接受急進黨的要求，擬解散法西主義聯合會，同月二十八日衆議院通過了禁止設立武裝團體的法案。法國民衆的反法西情緒則更見顯明：二月九日，巴黎工人利用二九暴動的紀念日，集合六萬人作反法西的



示威遊行；七月十四日，法國左派利用國慶節，在巴黎集合四十萬人舉行示威；九月二日，巴黎又舉行盛大的反法西斯示威運動。法國知識分子方面，也有「知識分子反法西斯監察委員會」之組織，牠的會章裏面，有着這麼有意義的話：「我們敬向勞動同伴宣言：我們決心聯合他們共同反對法西斯蒂的專政，以求拯救人民所獲得的權利與自由。」素來中立的智識分子，竟願同勞動者站在一條戰線上，足見法國社會反法西斯鬥爭之熱烈了。至其它各國的反法西斯情緒，也很有深刻的表現：如七月二十七日紐約舉行反國社黨的示威；十月二十六日，美國各種左傾團體，勞動團體，和平主義團體，黑人團體等，應「反法西斯同盟」的召集，在紐約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反法西斯示威遊行；十月二十七日倫敦舉行一個反法西斯大會，參加者約在三萬人以上，會後繼以示威遊行；八月二十三日，瑞士首都舉行反法西斯的示威運動。

在資本主義支配下的那些國家裏，這種種反法西斯運動的反面，大部份是擁護民主主義的運動。擁護德謨克拉西是成了一九三五年政治鬥爭的口號，即歷來鄙棄德謨克拉西的極端左翼分子，也為時勢所迫，反而表現了擁護的態度。這是說資本家所厭惡的民主主義，現在反為廣大民衆

所擁護；而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鬭爭，竟然成爲廣大民衆與資產家勢力的鬭爭。

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就是決定這個鬭爭前途的一個重要年頭。法西斯主義既成爲絕對不合廣大民衆社會的需要，且與後者處於絕對的對敵地位，牠的命運，當然就繫於民衆反抗組織之強化中了。由現在「人民陣線」壁壘之日趨鞏固的情形上說，法西斯主義顯然已受到空前未有的打擊了。

在政治方面，已暴露了資本主義極端右傾政權的沒落，而在經濟方面，資本主義本身沒落的趨勢，則有了更顯明的表現。

## 第二章 一九三五年的經濟與社會

社會的生產手段，若有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必與既成的生活狀態相衝突，結果發生了社會革命。過去人類社會史的演變，已經充分的證實這個法則是一定不移的了。

我們既承認了社會組織是以經濟構造為基礎的，那麼，即使是為檢討短短一年中的社會狀況起見，也不能不先估量這個時期中經濟活動的方式。因為我們至少可以說，這一短時期的社會狀態，與整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狀態一樣，是受了經濟形態的支配：這就是說，經濟活動的演變，尤其是生產情形的演變，無時無刻不判定了整個社會的變化。

現階段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機構之表現了與社會生活相矛盾的一個事實，是無可諱言的。一九三五年的牠們經濟活動，又進一步踏上不健全的路徑，也是顯而易見的趨勢，而這個趨勢便格外在社會上映出了這種內在的矛盾現象。矛盾現象愈深刻，就反映着現有社會組織之愈陷於

動搖的局面。

此外，一九三五年中又表現了一個確定的事實，即由資本主義本身來解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希望與試嘗，已因種種如統制經濟之類的手段不能解決社會問題，特別如美國復興法規的慘敗，而成爲畫餅了。現在浮在我們眼前者，無非是資本主義的沒落徵兆。在一九三五年中，這些徵兆在社會上暴露最顯明者，有下列三種：

(一) 自受大恐慌震撼以來，資本主義的繁榮始終不能恢復，且轉入特種蕭條的階段，揭露資本主義現社會之無好轉的希望。

(二) 因爲恐慌的襲擊，強化了國際對立的局面，轉入戰時經濟活動的階段而增重現社會的矛盾。

(三) 由備戰的狂熱而嚴重影響了恐慌襲擊下的各國財政，加緊了現社會的危機。  
本章就在這三種現象上分別檢討一九三五年的社會一般狀況。

## 第一節 一九三五年的不景氣與社會

自一九二九年秋天爆發了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到一九三五年已歷六年之久。就這次恐慌的範圍和程度上說，遠超過了從前週期性恐慌的現象。當牠於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之交達到恐慌最高度的時候，世界生產是一落千丈，農業恐慌追隨了工業恐慌的後跟，原料價暴跌至百分之六十以上，世界貿易額減至原額的三分之一，交易所倒閉，金融混亂到了極點，失業總數多至三千萬人。社會上備呈悲慘黯淡的景象，飢餓的人們成羣結隊的呼籲無門；上次歐戰後資本主義所藉以竭力支撐的基礎，驟然暴露了瀕於瓦解的局面。

根據世界景氣的學說，經濟恐慌的自療力量，應自行生長於恐慌和呆滯的過程中。因此，大家積年累月的等待自療力量的降臨。但相反的，這次恐慌卻不斷的帶着新的衰落傾向。在恐慌最尖銳的階段過去後，世界經濟恐慌，卻於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起，進入特種蕭條的階段。換句話說，即資本主義的繁榮已成爲過去的陳跡，一去而不復返了。到此，我們可以看清這次世界經濟恐慌之關

係現社會整個機構的前途，程度是遠在過去週期恐慌之上。

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大都根據前次恐慌的情形及眼前部份的進展，便認為轉機已經成熟。在企圖掩飾現經濟機構的矛盾中，他們對於所謂進展的範圍與意義，不免過事誇張。我們如若揭明了他們所誇張的進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則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是否好轉，可得一個精確的印象。

瓦爾加說：一九三四年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景氣，是「具有特殊性質的不景氣的第一年度。」所謂特殊性質的不景氣，是怎麼講呢？他說：「自恐慌明白表現起，到今已有五年的經過，而自循環的恐慌達於最低點之時起，到今也已在二年半以上，雖則如此，世界資本主義之不景氣的局面，依然繼續，走向繁榮的條件，絲毫無有：此之謂具有特殊性質的不景氣。」

一九三五年當然是一九三四年的局面之延長，這兩年間的世界資本主義景氣，彼此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或許在程度上有着高低不同的差異。如照瓦爾加所說，一九三四年是具有特殊性質的不景氣的第一年度，無疑的，一九三五年是牠的第二年度了。即是說，一九三五年的世界經濟，仍

然處在上述特種蕭條的階段裏。

且看下面所列世界主要國家工業生產指數的統計表，告訴我們的畢竟是什麼：

國別	世界主要國家工業生產指數表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德國	一〇〇・〇	一〇一・四	五四・〇	六一・五	八〇・九
英國	一〇〇・〇	一〇六・〇	八八・四	九三・五	一〇四・七
奧國	一〇〇・〇	一〇二・五	六五・九	六七・三	七四・〇
比利時	一〇〇・〇	一〇一・一	六九・九	七一・四	七〇・八
加拿大	一〇〇・〇	一〇八・一	六二・八	六五・二	七九・五
智利	一〇〇・〇	一二三・六	一〇七・六	一一八・五	一三〇・〇
丹麥	一〇〇・〇	一〇八・三	九八・二	一一三・七	一二一・二
西班牙	一〇〇・〇	一一二・一	九九・一	九四・六	九五・八
美國	一〇〇・〇	一〇七・二	五七・七	六八・五	七一・二
芬蘭	一〇〇・〇	九七・六	八一・三	九三・五	一〇七・三
					一一四・六(六月)
					一九三五年
					九五・二(八月)
					一〇九・九(第二季平均數)
					七九・一(五月)
					七三・七(五月)
					八七・〇(九月)
					一五三・〇(六月)
					一三二・一(七月)
					九四・七(一月)
					七九・三(九月)

法國	一〇〇・〇	一〇九・四	七五・六	八四・三	六二・八	七四〇・〇(九月)
希臘	一〇〇・〇	一〇一・八	一〇二・七	一一一・八	一二七・五	一二二〇・〇(三月)
匈牙利	一〇〇・〇	一〇二・三	七八・七	八五・八	九九・七	一〇四・七(第二季) (平均數)
意大利	一〇〇・〇	一〇九・二	七三・〇	八〇・五	八八・三	一〇二・一(六月)
日本	一〇〇・〇	一一一・四	一〇九・〇	一二六・一	一四三・四	一五七・八(七月)
挪威	一〇〇・〇	一一一・四	一〇三・〇	一〇四・五	一一一・六	一二三・五(六月)
荷蘭	一〇〇・〇	一〇二・五	六三・九	七〇・九	七一・六	六九〇・〇(六月)
波蘭	一〇〇・〇	九九・七	五三・七	五五・四	六二・八	六九〇・〇(九月)
羅馬尼亞	一〇〇・〇	一〇七・〇	九四・七	一〇九・八	一三二・六	一三〇〇・〇(三月)
瑞典	一〇〇・〇	一〇五・八	八三・七	八六・五	一〇五・八	一一五四・四(五月)
捷克	一〇〇・〇	一〇四・四	六六・三	六二・六	六九・四	七〇・九(六月)
蘇聯	一〇〇・〇	一二五・九	二三〇・三	二五一・二	二九六・六	—

(註) 上表根據國際聯盟統計月報

根據上表，我們可看出一九三五年世界經濟的大體情形如下：一九三五年世界生產指數



——蘇聯除外，雖則漸次上昇，但大多數只超過了一九三二年——恐慌達到最尖銳的時期——的水準，而絕未達到恐慌發生以前一九二八年的程度，而且有一部份國家，例如金集團國家的生產，卻仍繼續往下降落，甚至低過於一九三二年的水準。

至於世界農業生產，也仍輾轉於恐慌的病榻上。譬如在一九三五年，小麥，大麥，裸麥，燕麥的收穫，比較一九三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十，糧食的價格就開始降低，生產過剩的恐慌立刻又嚴重起來。「沒有一個國家達到了穩定的狀態，雖曾用各種計劃企圖改善，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村經濟，仍然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由價格增高，擴大生產，而至生產過剩，價格重新降落……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農業生產過剩就發展為生產不足的危機。但是在資本主義一般的恐慌的條件下，此種危機又將有轉為生產過剩危機的威脅……如是輾轉循環不已。」（見章末註）

按照一九三五年世界農工業生產情形，上面所謂種蕭條階段的論斷，是得到了強有力的實證。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就是受了這種經濟狀況的支配。

本來，社會之走向進展路上，應在經濟方面具有若干基本條件，主要的是生產消費兩方都有

繼續不斷的普遍的發達，尤其是生產的目標是在提高社會的消費，而後由整個社會物質生活水準之普遍的提高，進而有社會文化水準之提高。

根據這原則，而照上述世界各國的生產指數，來討論一九三五年的世界社會，則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說。第一，在生產指數益見降落的國家裏，所表現在社會方面者，當然是一般消費減少，困苦增加。第二，即以生產指數已經上昇的國家而論，社會也何嘗不是在這個現象的籠罩之中。除蘇聯及那些小國家外，一九三五年生產指數最高的國家，首推日本，次為英國，再次為意大利與德國。日本的經濟是建立在對內極端嚴酷的壓迫勞動大眾而置社會問題於不顧，及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實行其嚴厲榨取的手段上。英國是擁有最廣大殖民地的國家，亦以極力榨取殖民地的手段來抵償牠本身所遭受經濟恐慌的損失。至於意大利與德國，牠們雖然缺少了殖民地的供養，但因此格外用政治手段以榨取國內民衆。這些生產指數最高的國家，差不多是靠增加國內民衆的負擔或榨取被壓迫民族而博得表面上的繁榮，換句話說，牠們是將資本主義者本身的損失轉嫁於不幸的民衆或被侵略的民族身上。牠們的表面上繁榮對於整個社會並無影響，而社會全體只有

做了這種表面上繁榮的犧牲者，而始終不能得到牠的好處。

進一步說，各國生產指數之有部份的上昇，還有着關係國際問題的原因。一九三五年是戰爭準備白熱化的一個時期，各個國家在自己領土內，加緊生產戰爭開始前所必需的食料，原料，特別是加緊破壞工業，即軍事工業及直接或間接與軍事有關的工業的生產，同時保護主義的傾向也因強化經濟壁壘而格外顯明了。所以，基於保護主義與軍事工業之畸形發展而激成的生產指數上昇，充其量不過是跛行的景氣，既對於救濟恐慌問題不能生效，對於社會更缺乏補救的能力。

爲充分判明這特種蕭條的經濟狀況對於全世界社會的影響，我們可一檢一九三五年的世界貿易狀況：

世界貿易指數 (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年 別	輸 出	輸 入
一九三三年	三五·四	三五·〇
一九三四年	三四·二	三三·六

一九三五年一月	三二·九	三三·八
二月	三一·六	三一·五
三月	三四·五	三三·七
四月	三二·六	三三·二
五月	三四·五	三四·八
六月	三二·七	三二·二
七月	三三·五	三三·五

(註) 上表根據國際聯盟統計月報

依上表所列的指數，一九三五年世界貿易是大有每況愈下之概。全世界一般購買力的低落，而致商品販賣更形困難，當然是世界貿易萎縮的主要原因了。

經濟恐慌既是資本主義所無法避免的現象，而這次恐慌又是資本主義經濟機構全部動搖的徵兆，那麼，以這個殘敝的經濟機構的力量來掃蕩恐慌的氣氛，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實。上述各種狀態都告訴我們說，恢復資本主義繁榮的條件，在一九三五年中始終是沒有具備的。不過，資本主

國家的掙扎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它們現在還可以站在法西化組織的威力上，尤其是在鼓勵戰爭的路線上，以求打破恐慌的局面呢。

## 第二節 軍需工業發展與社會

今日的世界，本是國與國對立的局面，自受大恐慌的襲擊後，世界市場日見縮小，市場的競爭愈演愈烈，因之國際對立的局面也日趨尖銳化。時勢所趨，逼使無論任何國家都集中經濟力量於強化國防事業上。而且，資本主義國家在無法應付恐慌的狂潮中，便不擇手段來企圖振作牠們的經濟繁榮，戰爭因也成爲牠們恢復經濟繁榮之強有力的刺激手段了。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於本年一月十八日，在他的要求殖民地的演說詞裏，曾說道：「人們不能以乳酪射擊，只能以槍射擊……我們曾以對內政策的設施來做一般所能做的事，以求緩和經濟狀況，但是經過了許多時間，這些辦法還是不夠應付呢。」這就是說：任何辦法都表現是無效果的，現在唯有提出擴展領土的要求，樹起戰爭的旗幟，才有闖開出路的希望。

一九三五年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社會，所以格外露出惡化的現象者，就因為一面受了上述特種蕭條的經濟狀況的支配，它方面又受了戰爭前夜的特殊經濟活動的摧殘。這種情形是充分的表現於一九三五年的生產趨向上。

在工業生產中，一九三五年的特點之一，就是消費手段的生產之薄弱，與生產手段的生產之增加。例如煤、鐵、鋼、石油等的生產指數，均有顯著的上昇。這特別是基於列強擴張軍備，積極發展破壞工業。譬如，日、德兩國的備戰熱，是比其它列強格外劇烈，因此，日本的生產指數已經超過了一九二八年的水準，德國從一九三五年三月起，也超過了一九二八年的水準。反之，屬於消費手段的生產部門，一般都是減退的。即使若干部門稍有增加，總遠不及生產手段的生產部門來得快。在下表中，我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世界主要國家生產手段(A)和消費手段(B)的生產指數 (以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					
國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瑞典		波蘭		荷蘭		日本		美國		德國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一〇二・〇	一〇九・五	九六・〇	九八・四	一〇七・一	九九・五	—	—	一〇四・四	一〇八・六	九七・〇	一〇三・〇
九八・〇	七五・二	六一・五	四一・七	八八・九	四五・六	一〇九・三	一〇七・六	七九・二	三〇・〇	七四・〇	三五・四
九七・一	八〇・〇	六一・七	四五・九	九二・一	五四・九	一二三・〇	一二五・二	八七・九	四四・八	八〇・一	四四・九
一一四・七	一〇〇・〇	六八・八	五四・五	九二・三	五五・五	一二七・五	一四一・七	八七・一	五〇・二	八九・六	七四・八
一二四・五	一〇九・五 (五月)	六八・八	六一・二 (七月)	八八・九	四九・二 (七月)	一四一・四	一五六・四 (四月)	八九・八	六三・三 (七月)	七九・三	一〇四・八 (六月)

蘇聯		挪威	
(B)	(A)	(B)	(A)
一一二·〇	一三一·四	一一二·一	一一〇·〇
一八四·七	二八二·九	一〇八·八	九七·一
一九七·二	三一三·六	一〇六·四	一〇二·五
二二五·八	三七七·七	一〇八·七	一一二·八
—	—	九三·〇	九八·六 (七月)

(註) 上表根據國際聯盟統計月報

這種生產動向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生產手段的生產所包含的主要部門，事實上是軍需工業的生產。這種軍需工業的生產，無論其為生產的商品，抑為消費的商品，總沒有社會的生產意義。無論其為槍砲軍艦，或兵士的服裝食料，都不是下次再生產過程中必需的生產手段或消費手段；一度生產之後，就永遠不再進社會生產過程裏面。進一步說，這種軍需工業生產的增加，可使正常的工業生產削減，以致用於正常生產的社會生產縮小了。僅以這一點而論，社會所遭受的損害，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為要揭明全世界社會之受了這種動態的影響，我們可略一檢討鋼的生產和棉花的消費的



彼此消長情形。鋼是軍事破壞工業的骨幹；棉花雖爲各種經濟部門所採用，但基本的性質還是個人消費品，同時牠用於生產廣大民衆的消費品方面，實比任何其它紡織原料都要多，故棉花消費之減少，即爲廣大民衆的生活惡化之明徵。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若以一九三二年爲基數一〇〇，則在一九三五年，鋼的生產指數爲二一〇以上，而棉花的消費指數還不及一二〇。若將各國分別檢討，先就備戰最狂熱及增加國內民衆負擔最劇烈的德意兩國來說，這個現象是格外明顯的。在德國，鋼的生產指數，是由一九三二年之一〇〇突增至一九三五年之二四〇以上，而棉花的輸入指數，則由一〇〇降至九〇。根據德國國民經濟雜誌的統計，紡織品零賣的流通額，從一九三三年起，共只增加百分之七；而在這個時期，軍隊及其它類似的組織，都有了龐大的增加，需要量亦隨之擴大，至於平民所能得到的需要品自然比以前少得多了。所以，即照上述雜誌的統計，德國人民生活狀況，非但沒有確實的改善，實際上卻是十分惡化。可是，在這個時候，德國的軍需工業，都重新得非常活躍起來。至於意大利，軍事工業的生產，更是在縮小人民消費的條件下而進行的。從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五年八月，意大利機械工業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四一·七，而紡織工業

的生產卻減少了百分之一五·八。再以英美兩國的情形而說，大體上也不外是這個現象。英國棉織工業爲世界市場的主要供給者，所以英國棉花消費量的低落，一面反映了英國人民的生活狀況，同時也反映了其它仰給於英國的國家的生活狀況。但在一九三五年，英國鐵的消費是增加了百分之一六·五，而棉花的消費反而降低，棉花的輸入竟至降低了百分之二〇。因經濟恐慌而受損失最深重的美國，雖會以所謂「復興政策」來興奮一下，結果牠所揭曉的社會救濟方案，也無實效可言。在一九三五年中，美國的經濟狀況，說是有改善了；在八月間，牠的生產手段的生產，是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六〇，而消費品生產的增加額，不過百分之四而已。單就棉花上說，一九三三年九月美國的棉花消費量達到四十九萬九千包，而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僅達四十四萬九千包；平均在一九三五年九個月中，棉花的消費，比較一九三四年同一時期僅增加百分之二，而同時鋼的生產卻增加了百分之一七·五。棉花消費的增加所以比較薄弱，主要原因是在於一般人民收入增加之薄弱，或名目工資的增加，是遠不及物價高漲的程度。所以在這種經濟狀況下，美國人民的生活，也未有實際的改善。

基於上述，各國軍需工業——即構成生產手段的生產之主要部份——的發達，與軍火企業資本家之博得驚人的利潤，是在縮小人民消費的條件下而實現的。更有足耐人尋味者，即一九三五年恰是各國盛唱救濟社會困難的年頭，美國所施行的復興政策，其中是包括了許許多多解決社會問題的計劃；德國也提出了牠的經濟計劃，以救濟當前的危機及消滅失業的現象相號召，即在日本，各黨各派揭櫫救濟社會危機的政策也甚囂塵上。而結果呢，社會方面總沒有得到圓滿解決的辦法，種種危機依然繼續存在，且因破壞社會生機的手段的生產之活躍，使之陷於水益深火益熱的境地。到此，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的面目是畢露無餘。

或許，有人認為這一方面的發達，直接可促進與軍需工業有關的各門產業的振興，同時可增加在業者的人數，及提高工作於產業部門的勞動者的購買力，間接即是促進整個社會的繁榮了。這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家口裏，固然是振振有辭的認為可以刺激產業復興的手段。但整個社會的演進，是需要一般的，基本的及永久的發展，而絕不能靠於這種畸形的刺激手段。就使說，這種刺激手段可引起一時的局部的表面繁榮，但對於解除社會矛盾，絕不能發生效力。因為這方面

產業的活躍祇有增重國際的紛擾，牽動戰爭的危機，而社會矛盾仍然存在。就事實上說，在世界各國生產中，有某幾部門之所以能夠提高，多半是由於高度合理化的結果，而並不使在業者的人數照同樣比例隨之增加，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中，全世界的失業人數，事實上并未見得因為那幾部門生產的提高而有多大的減少（在後面敘述世界勞動狀況裏，我們將詳細指明這種實況。）至於全世界一般的購買力，根據上述消費手段工業之不能發達及世界貿易指數之降低，無甯說是逐步傾向於低落的途中；社會購買力之薄弱，即反映着在業者的生活并不能隨着前項生產的增加而有所改善。再由物價的變動和工資的變動上觀察，社會問題之嚴重當有更顯明的表現，譬如根據美國商業雜誌的統計，從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美國批發與零售的物價約增了百分之八，食品價格甚至增加百分之二六，而在業者的名目工資僅增加了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八。這個對照已明白表示了勞動者購買力並無提高的趨向。然這尙是根據名目的工資而言，若以勞動者的實質工資計算，則在他們深受貨幣膨脹政策的影響下，購買力當更形薄弱。由此看來，軍事工業之活躍，終究無解決社會問題的力量。

戰爭本是帝國主義打開難關的唯一最後手段，同時爲資本主義支配世界中所不能免除的災禍，亦是破壞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的原動力之一。那些國家，無論是有心的採取戰爭手段以求出路，或被動的奮力追隨這個狂潮以應付外來威脅，但結果之使牠們的社會組織發生動搖，乃是彼此一律的。至於以一部份生產因備戰的刺激而得到發展，遽認爲經濟轉機已告成熟，未免是資本主義經濟家過於矯飾的藉口。何況這種祇利少數人的發展，非但不能解決社會當前的問題，且使之益形嚴重，終於影響到現存組織的前途。再由下述各國財政狀況來觀察，益可證實社會杌隉不安的局面之日形嚴重。

### 第三節 一九三五年的財政與社會

因經濟難關之無法打通，隨之產生了戰爭的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是到了騎虎難下的地步，祇得竭其精力以行其鬭爭的政策。除經濟生產已經實現軍事化外，財政方面必然也陷於戰時的狀態。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者，即是這個年頭的社會，已經是凋敝不堪，憑政府的財政力量，已是不

能產生補救的作用，現在又因戰爭的白熱化，更轉移了政府關心社會問題的傾向，勢非使社會問題嚴重化不可了。

國家的財政本是密切的關係着整個的社會生活；譬如，社會生活的減縮，就直接的或間接的影響財政的收入；反之，財政支出的浩繁，則立即加重社會的負擔。所以，在檢討一九三五年的世界社會中，我們不得不特別注意各國財政動態的內容。

從一九二九年世界遭受大恐慌的襲擊以來，各國財政直接受了稅收減少的影响。這個影響要不外基於下列三種場合：（一）企業利潤降低，影響了佔政府稅收主要部份的所得稅的收入；（二）產業萎縮的結果，失業激增，消費銳減，影響了政府消費稅的收入；（三）恐慌潮愈高，保護政策愈趨極端，關稅稅率雖則提高，但因國際貿易額之銳減而深受影響。單就這三種影響財政收入的場合而言，無一不與整個的社會生活有關；或是明白表示社會狀況之惡劣，或甚至於產生加重社會困難的結果。但是，政府的支出不容減少的，尤其是在社會輾轉於經濟恐慌的壓迫下，政府負了救濟的責任，反要增加它的支出。由是，在以救濟社會為目的，或甚至假托這個目的之下，各

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便日積月累的激增，而演成了龐大的赤字的面。到了一九三五年，這種趨向，不但沒有停止或輕減，反有愈演愈烈的模樣。現在將一九三五年及近三四年的世界主要國家的財政預算列表比較如下：

世界主要各國財政預算統計表（單位百萬各國本位幣）					
國別	財政年度	收入（內外債除外）	支出	差額（+）餘額 （-）赤字	
英國	一九三三——三四	八〇九	七七九	（+）三〇	
	一九三四——三五	八〇五	七七七	（+）八	
	一九三五——三六	八二五	八二四	（+）一	
法國	一九三二	三五、四〇六	四一、四二二	（-）六、〇一六	
	一九三三	四三、六五二	五〇、五七二	（-）六、九二〇	
	一九三四	四八、二八一	五〇、一六二	（-）一、八八一	
	一九三五	四六、九九二	四七、八一七	（-）八二五	

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動態

德	國	一九三一——三二	六、八一二	七、四一五	(一)	六〇三	
		一九三二——三三	五、八二二	六、三〇五	(一)	五六三	
		一九三三——三四	五、九二八	五、九二八	—	—	
		一九三四——三五	六、一八三	六、四五八	(一)	二七五	
意	大	利	一九三一——三二	一九、六三八	二五、二〇八	(一)	五、五七〇
		一九三二——三三	一八、六六四	二二、八〇八	(一)	四、一四四	
		一九三三——三四	一六、七六三	二三、〇五四	(一)	六、二四一	
		一九三四——三五	一八、〇六一	二二、二七六	(一)	四、二一五	
		一九三五——三六	一八、三九六	二〇、二一七	(一)	一、八二一	
日	本	一九三一——三二	一、三七二	一、四七七	(一)	一〇五	
		一九三二——三三	一、三三二	一、九五〇	(一)	六一九	
		一九三三——三四	一、五四九	二、二五五	(一)	七〇六	
		一九三四——三五	一、二四九	二、二一四	(一)	九六五	
		一九三五——三六	一、三三六	二、一九三	(一)	八五八	



美 國	
一九三二——三三	二、二四四
一九三三——三四	三、二七八
一九三四——三五	三、八七九
一九三五——三六	四、一六一
	五、二九五
	七、二四四
	八、七五九
	八、七〇〇
	(一) 三、〇五一
	(二) 三、九六六
	(一) 四、八八〇
	(二) 四、五三九

依照上表，除了英國——其實餘額也逐漸減縮，沒有一個強國不是支出增加赤字膨脹的——即其它小國大都也是這樣情形。而且一九三五年度的實際情形還在上表所列數字之上；因為有若干臨時支出，特別會計的赤字並不包括在內，如德國的擴充軍備經費是守祕密的，意大利是年度的歲出還須加上空軍擴張費及東非遠征軍費，法國是年度的特別會計是未列在上表裏面的。

對於這麼巨額的赤字，各國是用什麼方法去填補呢？主要的步驟是不外提高稅收或增發公債。論增稅，則在這種不景氣的社會裏，人民已無加重負擔的能力了。那麼，只有增發公債一途，亦即以間接手段增加每個人民對於國家的負擔，這還可以做一個剜肉補瘡的救急辦法。於是公債政

策便成爲歷年來各國財政主要的開源政策。一九三五年仍是公債政策積極施行的年頭，下列比較表可明白表示出來。

世界主要各國內外債統計表(單位百萬各國本位幣)				
國別	年月日	內債數	外債數	內外債總數
英 國	一九三二、三、三一	六、五五七	一、〇九〇	七、六四八
	一九三三、三、三一	六、七九九	一、〇六〇	七、八六〇
	一九三四、三、三一	六、九九四	一、〇三七	八、〇三〇
法 國	一九三二、三、三一	二八四、三一五	一七五、四三〇	四五九、七四五
	一九三二、二、三一	二七六、〇五八	—	—
	一九三三、二、三一	二八九、四七八	—	—
德 國	一九三二、三、三一	八、九一八	三、二二〇	一二、一三七
	一九三三、三、三一	九、二九〇	三、〇四二	一二、三三一
	一九三四、三、三一	一〇、三四七	二、〇六〇	一二、四〇七

	一九三四、一、三〇	九、九四一	一、八二〇	一一、七六一
意大利	一九三二、六、三〇	九五、五七二	一、六九六	九七、二六八
	一九三三、六、三〇	九七、二一五	一、六五三	九八、八六八
	一九三四、六、三〇	一〇二、六二二	一、六〇八	一〇四、二三〇
	一九三五、一、三一	一〇五、〇〇四	一、五五九	一〇六、五六三
日本	一九三二、三、三一	四、九三九	一、四七三	六、四一二
	一九三三、三、三一	五、九八四	一、三九〇	七、三七四
	一九三四、三、三一	七、二六八	一、四一五	八、六八三
	一九三五、三、三一	七、六八八	一、四〇三	九、〇九〇
美國	一九三二、六、三〇	一九、四八七	—	一九、四八七
	一九三三、六、三〇	二二、五三九	—	二二、五三九
	一九三四、六、三〇	二七、〇五三	—	二七、〇五三
	一九三五、六、三〇	三一、〇八七	—	三一、〇八七
	一九三六、六、三〇	三四、二三九	—	三四、二三九

巨額公債之發行，則不得不講求擴張公債消費量的政策。比較直截的辦法當為放棄金本位，使中央銀行解除了紙幣兌現的責任，而可無限制的發行不兌換紙幣，隨着貨幣價值低落，公債的發行也無限制了。固然歷年來若干國家之放棄金本位，其動機不專在於擴大公債消化的限度，但這個限度因而被擴大，卻是一個確定的事實；通貨膨脹之因巨額公債發行之增加而愈演愈烈，這也是無可諱言的。這個局面開展的結果，是貨幣價值低落，購買力減少，物價騰貴；而勞動者工資並不能照同樣比例增加，社會問題因而愈形嚴重了。

而且，社會增加了許多負擔，事實上牠所得到的救濟是極有限的：失業問題並未解決，人民的生活並未改善。各國政府所最關心的所最努力的卻是在另一個範圍上。估各國歲出最大部門者，名義上是公共事業，而所謂公共事業也者，大多數是直接或間接與軍事有關的事業。理由是國際對立日形尖銳，當前的急務應為強化軍備以準備第二次大戰或以維持國家的安全；由是軍事費之逐年累增，便成為必然的和普遍的趨向。下表可與我們一個精確的印象。

國別	最近三年世界主要國家軍事費累增表(單位百萬各國本位幣)					
	一九三三年度	一九三四年度	一九三五年度			
英國	軍事費 一〇八・〇	對總預算之百分比 一三・九	軍事費 一一四・〇	對總預算之百分比 一四・五	軍事費 一二四・〇	對總預算之百分比 一七・〇
法國	一一、四四七・〇	二二・二	一一、一八七・〇	二二・三	一一、九〇〇・〇	二一・〇
德國	八七九・二	一四・八	一、三五三・〇	二一・〇	—	—
意大利	四、五八四・〇	一九・〇	四、三〇〇・〇	二〇・八	四、六一四・〇	二三・二
日本	八五一・〇	四〇・〇	九四一・〇	四四・〇	一、〇二二・〇	四八・〇
美國	四七九・七	一二・三	六一二・八	一四・二	七九二・五	一七・六

據上表，一九三五年度軍事費在歲出預算中佔了最高的比數者，首推日本，幾乎佔了歲出的半數。其次為德意，不過表裏面還沒有表示牠們正確的軍事費數字；意大利方面，須另加鉅額的非遠征軍費及五萬萬里拉之空軍擴張費；德國軍事費支出之鉅，更可驚人；據邱吉爾在英國下院

所披露的消息，則德國在一九三五年一年中用於備戰的經費，或竟達至英金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至法國一九三五年度的軍事費預算，應加上強化國防各種工事費，據議會反對黨的估計，總數當達至百五十億至百七十億佛郎。

受到這些開了空前紀錄的龐大軍事費支出的實惠者，當然不外少數的直接或間接與軍需工業有關的產業家，而社會全體莫不做了這個「竭澤而漁」的財政政策的犧牲者。譬如德國儘可禁止私人工廠純為經濟利益起見而從事擴充，而它方面則儘量將資本支出用於戰事準備上（根據邱吉爾在英國下院的演說。）最顯明的事實，是德國從前工人失業津貼費的預算為三十五億馬克，現在則減為十五億：這個事實就可表示德國政府對於救濟社會的態度。一般的說，各國政府對於軍費的支出，如國防計劃，造艦程序，殖民地侵略戰預算等等，都不惜多方羅掘，促其實現。即對於那些直接或間接與軍需工業有關的企業，也源源給與巨額的津貼。一面這樣的增加社會的軍事費負擔，另一面又作救濟社會的幻夢，這分明是根本相抵觸的矛盾現象。所以，如美法等國，儘管撥出大批款項，倡言創辦公共事業以救濟社會的危機，而事實上社會大眾仍輾轉於極度窮

困的境遇中。即以美國復興法規而論，牠只有產生了與牠所標榜之救濟社會的目標完全相反的結果。這可由下列城市銀行對於工商業約一千五百家股份公司的營業統計裏明白表現出來：

一九三二年總損失（單位一百萬美金）	九七
一九三三年總純利	六四〇
一九三四年總純利	一〇五一

這是說，施行復興法規之後，一千五百家最大的工商業股份公司便得十萬萬美金以上的贏利。這種贏利的來源，一方面是犧牲小企業來發展獨佔企業的，另一方面是基於抑壓勞動生活條件的結果。當初美國武斷主義者所稱爲和平的「社會革命」的「新計劃」結果祇有利於大資本家，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了。

依照上述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狀況，來觀察一九三五年的社會，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

資本主義制度所無可避免的恐慌及戰爭危機的襲擊，已充分證明現社會的內在矛盾是無

法消泯的，而在資本主義極力掙扎之中，矛盾卻愈形深刻，過去對於社會危機，尙高談其改良政策——雖然改良政策根本是無效果的，現在則連改良政策也在擯棄之列了。資本主義現在除站於準備戰爭的統制經濟上，再也找不到闖開出路的辦法。不過，在這種趨勢中，社會恐慌之益形嚴重，無非是勢所必然的結果。

（註）斯皮克托著：「一九三五年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總結」譯文見時事類編第四卷第三期。



## 第三章 一九三五年的勞動

在上面兩章檢討一九三五年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關係中，我們會揭明資本主義社會危機之嚴重化，並且指出支配層獨裁之急速度法西化的結果，與國際戰雲凝結的結果，更露骨地加重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之分裂。這種趨勢必然明顯的表現於一九三五年的勞動問題上。

勞動問題，不僅是單純的勞動大眾的生活條件的問題，同時還且包含了意義更廣大的勞動政治運動的問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所釀成的結果，是勞動大眾的窮乏與不滿之擴大。以窮乏言，即是勞動大眾生活的惡化；以不滿現狀情緒的表現言，則形成各階層的對立關係之空前激化。而且在窮乏範圍擴大中，中小社會階層也陸續陷於無產化，而加強勞動大眾的壁壘。

### 第一節 一九三五年的勞動者生活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大眾所最感覺痛苦的，與構成這個社會最大危機的，當然首推失業問題。失業是資本主義經濟機構裏所無可消除的現象，也就是現時代生產手段之合理化及集中化之難於避免的結果：在繁榮時代也依然存在，在蕭條時代自然格外嚴重。老實說，牠並不是現在一種特殊的情形，但大家都一致承認這次失業狀況是到了空前所未有的那麼緊張程度。在另一方面說，失業是資本主義經濟機構與社會生活狀態相矛盾的一個最顯明的現象，牠是搖動現社會基礎的最大因素，代表資本主義勢力的支配層是無時無刻不感受牠的威脅。所以，失業這個問題，不僅關係着社會最廣大民衆的生活條件，而且關係着整個社會的前途。

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襲擊以來，失業的人數是打破了歷來的紀錄，社會上所看見的是鴿形菜色的人們充斥街頭，所聽見的是救濟失業的呼聲。那些資本主義國家是皇皇然如大難之將臨，用盡心思提出許許多的救濟計劃。一九三五年，是已經嘗試了好些計劃，同時又是號爲經濟已經好轉的年頭，失業問題是否有了緩和的趨勢呢？

然而，在一九三五年，當我們談到無數的失業軍的時候，這就不是像指一向存在的失業情形

那樣，也不是像指各種職業裏面所固有的過剩失業律與季節失業那樣，我們所說的仍然是那個普遍而長期，龐大而無可救藥的失業現象。如若我們要準確的明瞭牠的重要性，則有賴於舉出確實的數字，但因這個問題的範圍廣大與原因複雜，確實數字事實上是很難得到的。不過，就是根據官方所公佈的數字，我們至少總可產生一種可驚的印象。下面就是一九二八年（即恐慌前）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五年世界主要國家的失業工人統計表：

國 別		世界主要國家失業工人統計表（單位千人）				
年 度	美 國	英 國	法 國	德 國	日 本	
一九二八年	三、九四七	一、二九〇	一五	一、三五三	—	
一九三四年	九、七四二	二、一七一	三七六	二、六五八	三七三	
一九三五年 第一季	一、四八九	二、二三七	五三四	二、七一三	三六七	
第二季	—	二、〇二〇	四六一	二、〇四三	三五六	
第三季	—	一、九六七	四一七	一、七二五	—	

第四季 十月	—	—	一、九一七	—	—	一、八二八	—
十一月	—	—	一、九一九	—	—	一、九八五	—
十二月	八、九九二	一、八六九	—	—	—	二、五〇六	—

依照上表，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如下：在這些國家裏面，一九三五年的失業數字仍然是非常龐大，有的是表示逐年增加的趨勢，有的雖形成了停止的狀態，但恐慌現象始終不能緩和，永為社會上最嚴重的問題。我們如若將這五個典型的國家分別檢查，則將進一步明白這個趨勢。

先就美國講，牠的失業恐慌是特別嚴重的。羅斯福的新政大部份是針對着這個恐慌。美國於一九三四年發行了恐慌時期的公共工程公債計三億五千萬金元後，又應羅斯福的急切要求，再通過了基於同樣目的的新借款原則，一九三五年一月又通過了空前四十八億八千萬金元的公共工程預算案。流動這麼巨量的金錢，求使數百萬失業者得到工作，這確是驚人的豪舉。但在數字上我們卻看到完全相反的結果：一九三五年的失業者人數並不比一九三四年減少，尤其是第一季的數字且遠超了上年度的數字而與恐慌最高點的一九三二年的數字相等，並且一九三六年一

月的美國失業人數又增至九、七、一五、〇〇〇人，即是說，超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之八、九九二、〇〇〇，又迫近一九三四年的數字了。由事實的證明，美國的救濟失業政策並未產生顯著的成效，而失業的恐慌是永為黃金國社會的最大威脅。

英國政府對於救濟失業的政策，也進行不遺餘力，一九三五年一月，下議院曾通過了一個失業救濟法。但在是年七月，工黨就以政府救濟失業無方，在下院提出了彈劾鮑爾溫內閣的議案。若就實際情形說，一九三五年第一季的失業數字，並未比上年減少；第二季以後，雖然稍為好轉，但一九三六年頭兩個月的失業數字，又回到二百萬以上了。

法國對於失業恐慌，是舉國皇皇，竭力呼號，政府特於一九三五年一月通過一個失業救濟法，以後又決定提前完成公共事業的計劃，藉使失業者得到工作。但法國的失業數字卻年年增加，尤以一九三五年第一季達到了最高點。而且，法國的失業數字，是就被救濟的失業者計算，未必是正確的統計，有人甚且估計法國的真實失業者的數字是與被救濟的失業者的某種倍數相當。

一九三五年的德國是竭其全力以發展軍備的。我們在報紙上隨時看到披露德國製造最大

批軍用品的消息，克虜伯廠是全部復工了，特易茲森廠和孤爾茲卜廠不斷的吐出濛濛的黑烟，德國天空翱翔着無數的新飛機。軍事工業這樣的發展，應當使勞動就業率顯著的好轉。然而，德國消費品工業與商業的職工人數，合計有八五〇、〇〇〇人以上，約當生產手段工業的職工人數之二倍，而消費品工業是非常不振，這怎能夠使勞動市場因軍需工業的發達而得到滿意的影響？德國官方統計告訴我們說，失業人數已由最高點之一九三二年的五、五八〇、〇〇〇，減至一九三五年第一季之二、七一二、〇〇〇，及第三季之一、七二五、〇〇〇。但是，德國官方統計的可靠程度到底有多少，是一般人所深感懷疑的。譬如，有人保證德國有工可作的人數是超過一千六百萬乃至一千七百萬名，而據其它的統計，德國可接受工作的人數為二千一百萬左右，那麼，德國的無工可作者不僅是二百多萬，而是四五百萬以上了。其實，德國政府所謂失業工人，是把那些強迫「回到家庭」的女工人，參加「勞動服役」的青年工人，以及被放逐，或監禁和剝奪了津貼的左傾工人或猶太人，都除外不算的。至於參加「勞動服役」者，每月只領到二十五個馬克，在農場工作者，只賺得食宿的供給——這種待遇實不比失業情形差多少。而且，我們就使完全根據官方所

公佈的數字，對於失業減少的現象也只能認爲是暫時的。的確，從一九三五年第四季起，官方統計告訴我們說，失業數字是逐月上昇，到是年十二月底又回到二百五十萬。一九三六年頭兩個月，失業人數都在二百五十萬以上。到每年冬天失業增加，原是很尋常的事實，但在一九三五年，失業增加比較前一年還早兩個月，從九月起就表現了這個趨勢。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個月的失業人數便增加了五十二萬多人，以後恐怕還有鉅量的增加。

日本失業人數之略見遞減，大約是「軍事膨脹景氣」所形成的結果。但在上表所列數字裏，農業勞動者當然不會包括在內。日本是舉世皆知的農村經濟日就破產的國家：在農村經濟處於崩潰的過程裏，必然不斷的製造着大批的失業預備軍。

至於其它國家，如意大利，捷克，西班牙，奧大利，波蘭，比利時等等，沒有一個不是對着幾十萬以上的失業軍而一籌莫展。在一九三五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的失業現象，雖有短期的減退，但整個的趨勢是向上的。大抵在最工業化而生活程度最高的國家裏，失業現象似乎是最嚴重的。這也可以說，資本主義制度登峯造極的國家，是最不容易輕減失業潮的襲擊。

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有的人認為失業是由於人口過多，有的人則說是由於多數國家的人口不復增加像從前那樣快。認失業是由於人口過多的人們，必然認移民是救濟失業辦法，因此開拓疆土，經營殖民地便成爲這種見解的邏輯結論了，人口減少造成失業之說，是因爲人口減少，物品需要也減少，因此，鼓勵生育也成爲資本主義國家的新政策了。這兩方面的意見，無論其相互的矛盾是到了那樣程度，但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德意兩個典型的法西主義國家——似乎有同時採用的趨勢。我們固然有許多理由可以證明他們的錯謬，但事實勝過雄辯，我們就舉出一種事實來做反證罷。

蘇聯政府成立之後，也曾一度苦於失業的恐慌。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牠的失業人數爲一、三四四、〇〇〇人；一九二九年四月，達到了最高點之一、七七二、五〇〇人——在那時候，蘇聯工人總數僅爲一千萬至一千一百萬，失業的比數是很高的。然而，一到第一屆五年計劃於一九二九年開始後，一九三〇年初，失業人數就已銳減，到一九三〇年七月，蘇聯的失業現象就完全消滅。直到於今，個個有工可作，再也不知失業現象的痛苦了。



從蘇聯在最短期間中消滅失業現象的事實裏，我們格外證實失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之一種表現。牠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毒瘤，非尋常刀藥所能割治的。上述各種數字，不僅告訴我們說，在一九三五年中這個現象是沒有緩和的趨勢，而且說，未來的緩和的條件，到於是沒有具備的。

末了，我們還須注意一個現象，即青年失業情形是非常嚴重。有的國家的失業者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年在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最低的如瑞士，也到了百分之一五。在所有其他國家中，是由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不等。社會上荒蕪着這種巨量的年富力強的工人，未來的影響是更不堪設想了。

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大眾裏，除有着二千萬人正過着長期失業的痛苦生涯外，其他僑伴有工可作的勞動者，是同樣處於極端不幸的境遇裏。

失業恐慌之未見緩和，既如上述，而在另一方面，如若我們觀察一九三五年各國就業工人的數字，則各國就業工人的數目，也未有顯著的增加。例如，在復興法救濟下的美國，一九三五年頭三

個月的就業指數（以一九二九年爲基數一〇〇）爲七五·一、七七·五及七八·六，這與一九三四年同期之七五·一、七四·一及七七·一比較，增加的程度是很有限的。其實，有許多勞動者，名義上是號稱有工可作的在業者，而實際上是過着半失業者的生活。例如，當一個產業家看到批出減少的時候，往往不願意辭退一部份工人，而寧願減少工作時間，或者每天減少若干小時，或者每星期把工廠關閉若干小時，因此，在這種工廠裏的工人，無形中因工作減少而失掉一部份的工資，遂成爲部份的失業者了。

現在即就完全有工可作的在業者來說，我們也看到他們生活惡化的現象。工人生活惡化的原因，當然首推工資之不能提高，或甚至降低。例如美國工資指數，若以一九二三年爲基數一〇〇，則一九二九年（即恐慌襲擊前）爲一〇五·四，而一九三五年頭三個月仍站在八六·八、八七·六與八八·二。在六月初，美國總工會主席格林會宣佈說：七小時工作日制制的恢復，在有些場合，與旅館、飯館和其它工役部門中的十二小時工作日制同時存在，這是一般的情形。在森林業中，有很多處所，勞動時間增至每週六十小時，而工資則平均減低了百分之四〇。紡織工業，尤其是在南

部，實行大量的減資，有些南部的工人被迫每週做五十個鐘頭的工作，僅得到七元美金的工資（見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倫敦泰晤士報）。在實行復興法規之下，獨佔資本的利潤，是大大的增加，而工資卻沒有提高，甚至也有發生減低的情事。

以失業人數已逐漸減少的日本論，則勞動階級的生活是每況愈下，下表可明白揭示出來：

日本職工與工資指數比較表（以一九二六年爲基數一〇〇）				
	職工數	工資總額	實收工資	定額工資
一九三一年	七四·四	—	—	九一·六
一九三五年一月	九五·八	八七·二	九一·〇	八二·二
二月	九六·五	八九·一	九二·三	八二·〇
三月	九七·五	九一·一	九三·四	八一·八
四月	一〇〇·七	九〇·八	九〇·二	八一·四

根據上表，日本職工的數目，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是比是一月增加了四·九，工資總額則僅

增加三·六，而實收工資與定額工資反各減少了〇·八；尤其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份與三月份比較，更顯明的表現這個趨勢：職工數目是增加了三·二，而工資總額反低落了〇·三，同時實收工資與定額工資的指數，與一九三一年的同樣指數比較，則職工增加之鉅與定額工資低落之大，恰成了一個驚人的反比例。在一九三五年中，日本的軍需工業是突飛猛進的，但軍需工業的工人，雖負擔了過度的工作，而他們的基本工資卻毫無增加。

德國勞動工資的情形，必然是更見惡劣的。據瑞士某家報館的調查：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間，就業者的每年收入的平均數，爲一二五〇馬克。按照德國的生活程度，這個數目已經是很低的。可是，那裏面所謂就業者，其中三分之一是收入比較高的公司職員與官吏，若把他們那一份除外，則純粹工人收入的平均數當然更要低了許多。而且，在這個數目中，又須除去國社黨政府所創辦的各種直接間接捐於軍備上的捐款。這裏所謂捐款，名義上是號爲自願捐，實際上是強制的，有在當局監視之下，在工資裏面將每年四次從星期日的餐食扣除出來的捐款，有所謂秋季捐等種種名目。這種辦法是無形中減低了勞動大眾實收的工資。所以，德國勞動者的收入實際上是

非常的少。然而，國社黨機關卻告訴我們說，德國國民的收入是比前增加了。假定德國國民的收入的確比前增加，則我們可根據上述情形，斷言收入增加者絕不是勞動大眾，而是站在國社黨幕後的少數大資本家。我們知道在一九三五年中，德國勞動者是過着極苦的消费生活，假使國社黨當局所說勞動收入增加是真的話，何以國內消費沒有跟着同樣的曲線上昇？這是否因為被抽扣，個人的部份失業之故，實際的收入所以沒有低落的趨向呢？老實說，德國在業者的工資實際上是略高於失業者的津貼費而已。

已受戰爭的嚴重影響的意大利，勞動者是格外成爲剝削的對象。意大利的勞動工資，原是在僱主絕對支配下的所謂集體合同內規定的，但實際上勞動者所獲得的工資，卻還低於合同內所規定的。這是因爲勞動者還須負擔許多直接或間接的稅捐的關係，例如，除開工資稅百分之十以外，還須加上疾病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以及法西斯蒂工會會費種種負擔。自從大恐慌爆發以來，政府更加緊運用其降低工資的政策。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之間，一切工資都已普遍的減低了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二〇。一九三四年四月間，政府又將公共事業的勞動者的工資減低了百分之

六至百分之一二；同年五六月間，一切工業部門的工資普遍的減低了百分之七至百分之一二。在阿比西尼亞侵略戰發動之前，法西政府已經藉激減勞動者工資以爲刺激軍需工業膨脹的手段。到一九三五年，法西政府必然繼續施行其犧牲勞動者的政策，以期達到殖民地侵略的野心了。

上面列舉的例子，可以證明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工資，幾乎是普遍的一天比一天減低。設使我們又看到一九三五年各國政府的財政政策，如貶低貨值，限制輸入，提高稅率等等，在在都是嚴重的影響到勞動者的名目工資的購買力，則對於勞動者所得到的實際工資之無形的減少，是更難於想像了。在物價與生活費工變動中，就反映出勞動大眾的痛苦。

資本主義各國施行通貨膨脹政策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在於刺激物價的提高，以收推動生產增加之效。如英美日等國，自從放棄了金本位後，物價確是迅速的高漲。假使勞動工資能夠照物價高漲的比例而同時提高，則勞動大眾的生活還不至特別受了這個政策的影響。然而，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勞動工資卻是普遍的趨於減少。而物價呢，雖則還未達到一九二八年的水準，雖則資本家還未十分得到滿意，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總是不斷的漲高，恰與勞動工資的減少成爲反比例。

當資本家還覺不能壓足他們的冀望的時候，勞動大眾已經陷於無力生存的境地了。在前面檢討一九三五年的經濟情況的時候，我們曾揭明各國生產手段的生產激增，而消費手段的生產落後，那就是說明勞動大眾的環境愈形惡劣，購買力激跌，而消費量銳減了。

物價的高漲，就是說生活費水準激增。如若根據國際聯盟統計月報所公佈的各國生活費指數，則在一九三五年中，除開幾個例外，幾乎是普遍的提高。在這種情形之下，收入反而遞減的勞動者，其痛苦實不堪設想了。我們如若提出幾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來敘述其勞動大眾在這種環境下的生活狀態，當可得到一個更深刻的印象。

先拿德國來說，牠在一九三五年中消費品工業之特別不振，已如上述，至於不振的原因是在於爲食糧品與主要消費品的價格之異常騰貴。德國的勞動大眾，就因爲食糧品的價格暴騰，其收入的大部份是被這方面吸收乾淨。在這種環境中，國社黨政府只能強迫他們耐守節衣縮食的生活了。

意大利的勞動者，依照其法西斯蒂政府的政策，應爲更廣大的生產利益而犧牲。不僅是他們

的收入應須儘量的壓低，即他們的精力也要儘量的犧牲；產業家有儘量增加勞動者工作的權利，勞動者則有儘量增加他們工作的義務。無論是勞力方面或物質方面，他們都遭受最嚴酷的摧殘與剝削。自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軍事行動開展之後，意大利勞動大眾的生活當然更趨惡化。即在開戰之前，大眾購買力已經顯著的減少了：據米蘭零售店同盟的報告，售出額的指標，如以一九三四年一月爲基數一〇〇，則一九三五年春季是跌至九五·八，一九三五年八月又跌至六四·三。軍事行動開始之後，政府之減少輸入，加稅，鐵路運輸加價，貨幣膨脹各種政策，在在引起物價的騰貴：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份一個月中，零售物價的指數即增加了百分之二〇。意大利勞動者的工資本來是很低的，現在更過着極其悲慘的生活。

日本從放棄金本位後，生活程度飛騰之速，是遠在其它國家之上，據朝日新聞社所發表的統計，日本生活費的指數，如以一九一四年爲基數一〇〇，一九三二年增至一六四，此後不斷的上昇，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增至一七八，十月增至一八四。必需品這樣漲價，勞動者除了作工外，當然是毫無所得。朝日新聞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於敘述日本工資指數低落與生活程度高昂的情形後，



曾這樣說道：「雖然工資銳減，生活程度卻向上發展……很悲痛的是：在工業「繁榮」的時期，工人狀況未顯露若何的改善，而另一方面，資本家取得了鉅大的股息。」日本經濟雜誌也於同年五月說道：「通貨膨脹的結果，日本工人遭逢更大的剝削。」這幾句話是代表了一九三五年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生活的普遍的現象。即以美國而論，復興法規曾以控制價格與生產的權力賦予工業家，雖使生產指數逐漸上昇，但因物價提高太速，勞動者生活深受影響，結果激成了許多勞動糾紛。

一九三五年是若干經濟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好轉的年頭。我們已在前面臚列事實證明這一年始終是輾轉於種種蕭條的局面中，姑不論牠在程度上是否表現了比過去進步的現象，但無論如何，對於勞動大眾，一樣是毫無裨補。他們之做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的犧牲者，是一步緊過一步。軍需工業的發展是在犧牲勞動大眾的條件下而實現的，但帝國主義者們仍然告訴他們的痛苦民衆說，戰爭是解決大家生活困難的途徑。然而，飽受痛苦的勞動大眾果然就能因此而不顧他們的飢寒交迫的境況嗎？

## 第二節 一九三五年的勞動運動

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大眾的生活條件之惡劣，已充分表現於前半章裏了。在極度痛苦的境況中，勞動大眾之積極圖謀解放，亦勢所必然的。所以，在另一方面看，一九三五年同時是勞動運動積極發展的一年。

勞動運動的目標，當然仍不外兩種：一是以罷工種種策略來要求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條件，一是擴大他們的政治運動以求改造不平等的社會，在一九三五年中，這兩方都有顯明的表現與進展。

在法西斯主義政府的社會政策下，德國和意大利的勞動者，都失掉了舉行如罷工各種反抗行為的權利。固然他們的生活是極度惡化，眼前是無從作行動的表現。可是，在其它資本主義國家裏，我們便看到罷工和示威的狂潮，是風起雲湧的瀰漫各地，

在施行復興法規的美國，雖盛唱保障勞動者應得的利益，以減少經濟之不平衡，但實際上勞

動者的狀況，往往因復與法規本身的流弊（如高速度擡高物價等等）而始終難於改善。因此，勞動者就利用罷工的權利來爭回他們的利益。一九三三年五月則有太平洋一萬五千碼頭工人的罷工，同年秋間有本雪文尼亞煤礦七萬五千人的罷工；一九三四年則有夏明尼城建築業與汽車業工人的罷工，舊金山十萬人的大罷工，以及三十餘萬棉織業工人的大罷工。到一九三五年，這種趨勢是日在擴大中：鉛鋅業的總罷工會發生了嚴重的情形，四十五萬礦工原定於是年七月一日舉行大罷工的計劃，雖因羅斯福之親自斡旋而幸未實現，但不久後碼頭工人卻鼓起罷工的大風潮來了。

據英國勞工部所公布的報告：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北部在一九三五年開始發生停業（所謂停業是包括罷工各種行動）的次數，是有五五三次之多，較之一九三四年的四七一次，是劇烈的超過了，而且，這個數目可說是突破了一九二五年以來的記錄。在一九三五年中，受到停業影響——無論直接的或間接的——的工人總數，為二七八、六〇〇人，在一九三四年則為一三四、一〇〇人，即是說，一九三五年比一九三四年超出了一四四、五〇〇人。若以停業中所損失的勞

工時間計，則一九三五年的總數爲一、九二四、〇〇〇日，一九三四年爲九五九、〇〇〇；一九三五年顯然比一九三四年超出多多了。至於一九三五年之五三三次停業的原因及目的，顯然可在下面分析中表現出來：在這五三三次的停業中，八四次是由於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發生的，四二次是由於工人反對減少工資而發生的，一二四次是由於其他各種工資問題的糾紛而發生的，一次是由於工作時間問題的糾紛而發生的，一五二次是由於各種特殊階級工人的雇用問題的糾紛而發生的，八五次是由於工作調整問題的糾紛而發生的，一六次是由於聯合貿易的問題而發生的，一六次是由於同情的舉動而發生的，其餘的三次是由於其它原因而發生的。根據這個內容，可以說英國的勞動罷工運動多半是爲着要求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條件。還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即在一九三五的停業工人裏面，有於一年中曾經受到好幾次停業影響的，尤其是煤礦業工人中，格外表現這種情形。在一九三五年中，有一個相當數目的煤礦業工人，受到了不僅一次的停業影響：屬於這一類的停業工人總數，約有二二〇、〇〇〇人，而煤礦業工人就佔了一四三、〇〇〇人。這個現象是告訴我們說，英國工人，尤其是環境最壞的煤礦業工人，在爲生活而關

爭裏，充分表現了愈接愈厲的情緒。

在法國，勞動的鬪爭也有熱烈的表現。一九三五年一月，則有各地失業工人赴巴黎請願，五月有大西洋船員的大罷工；到了七月，因為賴伐爾政府提議減薪，先引起數千公務員在巴黎舉行示威，繼之者則有八月六日勃萊斯海軍工廠工人的罷工，及八月九日都龍與勃萊斯兩處工人的罷工示威，反對政府的減薪政策，在末後一次的罷工示威中，甚至發生了工人與警察的衝突。

即在積極壓迫勞動運動的日本，也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發生了川崎船公司八千海員的總罷工。至在其他各國，罷工或示威的情事也不勝枚舉。舉其著者，則有墨西哥石油礦工的罷工，古巴首都的總罷工，加拿大雷其那失業工人之舉行暴動，丹麥五萬農民之在王宮前舉行示威運動等等。

不過，在資本主義強化牠的支配權之下，勞動者之要求改善生活條件的運動，無論在程度上是如何開展，終因其處於不利的地位而往往遭遇失敗。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中，勞動大眾積極開展他們的政治運動。在這個社會問題上，這個趨勢當然表現了更可注目的重要性了。

在一九三五年中，世界勞動的政治運動可說有了顯著的進展，因為，在勞動運動者看去，這一年的世界局勢裏有着了幾個有希望的因素。

第一個好現象便是社會主義祖國之蘇聯的實力與繁榮是突飛猛進。因為蘇聯地位之日趨鞏固，是成爲維持世界和平的一個新要素，並促使若干國家和蘇聯逐漸發生友誼的關係，因而使勞動運動容易得到同情。

第二個好現象是世界勞動者反法西情緒之熱烈，與法西勢力的發展已遇到若干牢不可破的障礙。

第三個好現象是勞動大眾的組織與行動已有了嚴密化和統一化的趨勢。

除蘇聯的進展情形另章敘述外，我們就在後兩個現象上，分別檢討一九三五年勞動政治運動的大略。

全世界勞動者一致的反抗法西主義的運動，在一九三五年中算是演得最熱烈的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述過反法西運動的進展情形，現在我們所注意的一點，是這個運動是以勞動大眾爲中

堅。過去勞動者反法西的組織之步步發展，在這裏我們無須細講，專以一九三五年論，如二月九日的巴黎六萬人反法西的示威遊行，七月十四日的巴黎四十萬人反法西的示威，七月二十七日的紐約反國社黨的示威，八月二十三日的瑞士首都的反法西運動，九月二日的巴黎盛大的反法西的示威，十月二十六日的紐約大規模的反法西遊行，十月二十七日的倫敦舉行反法西大會與示威遊行，無一不是以勞動大衆站在鬪爭的最前線。在德意日三個法西勢力的統治下，勞動者的權利之橫遭剝奪，生活條件之日趨惡劣，大足引起世界勞動大衆的猛省。他們現在確認和法西主義是不相兩立的。而且由過去之退避的消極的自殺政策，進而採取積極的抵抗的行動。法國與西班牙的法西勢力的衰頹，是表現了牠已在堅固的堡壘前面退卻了，同時是表現了與真正的勞動大衆接觸之後法西主義終難得志，與在法西戰線上勞動大衆的力量是如何廣大。

一九三五年的勞動政治運動，另一面是表示在反對戰爭的行動上。牠之反對法西主義的戰爭政策，其熱烈的情緒是不在於反對法西政權之下。一九三五年的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行動，當然給與世界勞動大衆以表示反法西反戰爭的情緒的機會了。

據「國際通訊」的記載，意大利工人革命黨曾向羣衆宣佈，說牠認爲這次戰爭的意義，無異是法西斯蒂把意大利進一步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牠並說，這種戰爭，不但侵犯了阿比西尼亞的獨立，同時是向意大利人民的基本利益作戰。意大利工人革命黨甚且策動了一種軍事的組織，要想轉變這個劫奪殖民地的鬭爭。我們祇須舉出意大利勞動者之反對本國政府侵略行爲的態度，就可概括世界勞動者曾利用這個機會以表示其熱烈反對戰爭的情緒了。

至於勞動政治運動之統一戰線的趨勢，可說是一九三五年的一個特徵。追溯法西斯主義獨裁崛起的經過，是因爲各國支配層在下層的反抗勢力尙未成熟的時候，鑑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帝俄的失敗，乘下層不能發動強有力的反抗，即舉全力加以打擊。而下層勢力所以不能發動強有力的反抗者，就是因爲他們內部分裂，缺乏了一致的鬭爭目標。德國國社黨的迅速得勢，可爲鐵一般的證據。經過飽受法西斯勢力的威脅後，勞動大衆頓然覺悟如果沒有統一的戰線，便無掃蕩法西斯氣的實力。因此，法國左派各政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訂立了一個所謂「人民陣線」來與法西斯勢力作戰。到一九三五年，法國人民陣線是繼續前進，勞動份子積極聯合，有日趨鞏固的模樣。同樣的



情形也開始在西班牙產生。即在日本，勞動運動似乎也有成立聯合戰線的趨勢。這種轉變確是一九三五年世界勞動者政治運動的新動向。

在檢討一九三五年整個的勞動情況後，我們的結論是：一方面是勞動生活條件之極度惡化，另一方面是勞動運動之積極企圖發展，質言之，即調和這兩方面問題的希望，是愈難實現。前途鬭爭之激烈，是可預期的。

## 第四章 一九三五年的婦女

一九二三年，國際婦女同盟召集大會的時候，亞士比(Ashtby)夫人曾問喀特(Catt)夫人說：「你覺得到那一天我們國際婦女同盟能達到牠的目標呢？」後者就回答道：「要到我們在莫斯科，羅馬，君士旦丁堡（即伊斯坦部爾）等處開過大會後罷。」

從這一年後，國際婦女同盟也在羅馬開過一次大會，俄國婦女十足的得到了一切與男子相等的權利，而第十二次大會恰是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在伊斯坦部爾舉行：當初所預期的條件，現在似乎表面上一一實現了。但是，所謂國際婦女同盟的目標，是否已經達到或有達到的徵兆？這在我們結算一九三五年的清帳裏，當然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

必然的，婦女問題的進展是在整個社會的進展的條件下而實現的。假使在前面各章裏，我們已經看到了整個社會趨勢的真相，則對這一年中的婦女狀況，不免要得到一個不良的印象。這個

印象就可在伊斯坦部爾大會裏產生出來。

在伊斯坦部爾大會中，國際婦女同盟宣佈說，對於本同盟在成立之初所採爲工作綱領的基礎的各項原則，現在牠仍當繼續遵守不渝；牠並且說，牠之遵守這些原則，並不因世界政治制度上或經濟制度上發生變化，而有所更動。至於那些原則，關於政治與經濟的問題方面，可由下列公式表現出來：

(一) 政治上的平等——在一切國家裏面，不論其政府制度的性質，婦女應擁有完全的自由的公民權利，與男性所擁有的一律相同。

(二) 經濟上的平等——全體婦女的工作權利當然受人承認，已婚婦女的工作權不得遭受任何妨害；獲取工作的一切可能門徑，婦女應能同樣的進去；同樣的職業上準備，應爲男女兩性共同設立；一切職業及公務位置，男女兩性應一律可以擔任，進級的待遇也應彼此一律，如若擔任同樣的工作，女性所領受的工資，應與男性相同。

這兩方面問題是關係着整個婦女運動的前途，也就是本章分別檢討的對象。

### 第一節 一九三五年的婦女政治權利

婦女政治地位之提高，是關係着整個社會的演進。尤其是在國際關係極度惡化與社會矛盾益形尖銳的今日，婦女參加政治生活與社會事業之成功，可為維持世界和平及促進社會發展的一個要素。反之，婦女地位之降低，也就可表現世界政治傾向的惡轉及社會糾紛變本加厲的現象。先就進步方面說，一九三五年也不乏良好的徵兆。俄國與土耳其，不是從前大家所目為最落後的國家嗎？革命後的俄國，不僅廢除了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至所有男女兩性間的政治上差別，經濟上差別，社會上差別種種，都剷除無遺，一躍而為婦女地位最發展的國家。一九三五年，蘇俄婦女仍然在繼續不斷的發展中。

同樣在最短期間內，婦女地位提高到與男子完全相等程度的國家者，當推土耳其了。當一九〇二年，國際婦女同盟在華盛頓開成立會的時候，代表土耳其婦女來出席者，乃是君士坦丁堡一個女學校的美國籍女校長。在那時候，土耳其婦女連親身出席的勇氣與環境都是沒有的。到了一

九三五年，即在她們的地位普遍的提高後，她們便邀請各國婦女代表到土耳其去開會，同時就地賞鑑她們奮鬥的成績。土耳其婦女之能夠參加政權，是開始於一九二九年。從這一年起，她們已有州議會，市議會，縣議會以及鄉村評議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從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以後，她們也得到國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了。她們之行使這個權利，實際上也不在男子之下：在一九三五年的國會選舉中，在行使投票權的比數裏面，婦女佔了百分之四八，男子也不過佔了百分之五二而已。一九三五年的土耳其國會裏面，就有着十七名的女議員。所以，伊斯坦部爾的總督，在國際婦女聯盟大會的開幕典禮中，能夠說道：「無論在那一方面土耳其已經實現了男女兩性的平等。」

再拿一個婦女地位比較惡劣的民族來講，我們也可看出婦女參政運動的進展。一九三五年，在印度方面，這個運動也會得到一番饒有意義的勝利，即在馬特拉(Madras)省內，有一個女子被選為立法院第一個女議員。

可惜，除上述之外，我們所看見一九三五年世界婦女在政治上的地位，無非是黯淡的和退步

的了。最刺目的當然首推在國社主義統治下之德國婦女的地位。直到現在，在表面上，德國憲法所規定婦女的政治上權利，還未有更動：婦女們仍然繼續行使投票的權利，而且仍有被選的資格。然而，國社黨當局乾脆就不提出她們做候選人，就不許她們有當選的機會。一九三五年的德國國會曾有三十五名的女議員，現在差不多都去任了。國社黨對於婦女問題的計劃，不僅要消滅她們的政治活動，且要進一步把她們從公共事業和社會事業中，趕回到家庭裏去。凡是與公共事業有關係的位置，不論是行政機關或學校，鐵路局，宗教團體等等，如丈夫或父親已經在那裏面任職，妻女就都不得被錄用。政府文官處更採取了一種特別限制的辦法，即凡不滿三十五歲的婦女，都不得被錄用，而男子則到二十一歲就有錄用的資格。依照國社黨人的見解，法官當然不是婦女所能擔任的職務，即婦女之學習法律充當律師者，也只許管到家庭方面的法律問題，業醫者只能診視婦女與小孩，女新聞記者只能談關於家庭與小孩的新聞，再不然的話，只能替國社黨充當宣傳員。在大學裏面，女生的人數也受了限制，不許佔到全校學生總數之十分之一。至於婦女在學校所學習的課目，也只限於家務或育嬰的學科。同時，政府又採取了種種鼓勵女子結婚的辦法。所以，在國

社黨統治下，德國婦女是離開了政治與職業的門戶，而去充當純粹的賢妻良母，即服膺國社黨所標榜的三K政策。在國社黨的組織裏，未嘗不有各種婦女團體，如「婦女服務隊」之類，但牠們所幹的婦女運動，目標並不在於爭取男女的平等，向改造社會的途徑邁進，而卻是宣傳國社主義的哲學，實現一個國社主義理想中的家庭。因此，我們看到繼從前婦女運動的活躍分子之後的，是一批與高彩烈的宣傳婦女新理想的國社主義的婦女領袖。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婦女運動，便於被壓迫和屈服當中，完全消聲匿跡了。

上述種種，是專就德國婦女地位的演變而言的，若另由社會上其它關係來看，我們或許可以發現這種種辦法是別有用意的。婦女回到家庭的口號，一方面是斬斷了婦女參加公共社會事業的生命，而另一方面，在非公共事業的勞動上，如紡織業之類，固然婦女是格外受了剝削，但因為她們在技術上比較敏捷，依然受人僱用。它如婦女服務隊的組織，在訓練期間，那裏面的份子須每日學習各種各樣的艱苦農作。依照這種種情形來說，國社黨的婦女政策，又何嘗不是使婦女擔任國家後防的職務：到戰事發生的時候，男子儘管離開家庭走上戰場，而後方的社會，因為有着理想的

婦女做基礎，仍然是很安寧很鞏固的。日本婦女的勞動狀況，何嘗不是已經受到了同樣的訓練呢？

在過去一年中，世界婦女在政治上的地位，除了幾個國家有着特殊現象之外，是沒有顯明的進展可言。所以，在伊斯坦布爾大會中，她們正式宣佈說：「在大多數國家裏，確實的進展是很少的。在狄克推多的政體中，婦女往往也擁有與男子同樣的權利。然而，這些權利究竟是什麼樣呢？」不幸的事實是很多的。譬如，在烏拉圭，婦女會於一九三二年取得政治權利的平等，但在一九三三年傾向獨裁的政變發生之後，這個平等的地位就受了危害，政府便頒佈了實際上足以妨礙婦女行使政治權利的辦法。在澳洲，婦女的政治地位，固然沒有受到當局的限制，但各政黨拒絕將婦女列入他們的選舉單裏面。在挪威，男女地位一向是平等的，但現在卻有打破這種平等的傾向，如挪威派往日內瓦的一名女性代表，所領的薪俸就不及她的男同事。

根據上述種種不利於婦女政治地位的現象，一九三五年的國際婦女同盟大會，一致的通過婦女選舉權公民權政治權研究委員會所提出的請願書如下：

「婦女選舉權公民權政治權研究委員會認為，男女同站在公民的地位，而彼此所享受的



權利不平等，實使婦女的地位受了一種嚴重的損害，因此，牠請求大會，使本同盟組織仍本自始到今所不斷從事的努力，而使所有各國的婦女，不分政治信仰及種族或宗教，都可得到一應公民的權利。委員會力請在婦女尚未解放或婦女投票權受了危害的國家裏，各個附屬團體，集中牠們的精神，以期達到上述目的。同時，在婦女已獲解放的國家裏，委員會力請各個附屬團體，不要鬆懈牠們的努力，使婦女之行使政治權，及這個權利之得到承認，都能保持不墜。」

關於在各種不同的政府形式下的世界婦女狀況的問題，大會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另外發表了一篇請願書。那裏面大體是為世界各國的婦女，要求在選舉方面，在代議制度的運用方面，在中央或地方的公務員位置方面，以及在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上，獲得與男子同等的權利。

無疑的，這些文件的內容，是代表世界幾萬萬被壓迫婦女的呼聲，也可以說是從婦女運動產生以來不斷發出的呼聲。然而，呼籲者儘管呼籲，普遍的實現依然是渺茫難期。就一九三五年的情形推想，除一部份已經得到滿足外，其餘大多數部份，至少在最近期間內，不見得會發生比較進步的變化。

## 第二節 一九三五年的婦女經濟狀況

婦女之爭取經濟上平等待遇，依照一九三五年的各方情形，更成爲不易圓滿解決的問題了。在伊斯坦布爾國際婦女同盟大會中，這個問題曾爲大會最重要的工作。負責研究這個問題的委員會，曾提出一篇大可注意的報告書，其中列舉各國婦女行使工作權利的障礙，及已婚婦女在經濟市場上之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這篇報告書也明白的指出在大多數國家裏面，無論是在公私職務的報酬上，婦女總受了極不公允的差別待遇。這個問題當然與上章所討論的一九三五年世界勞動問題，有着密切的關係。

單就世界經濟狀況上講，我們前面已經說明，一九三五年是處於特種蕭條的階段中。在這個時候，男性勞動者的地位，已充分表現逐步降落的趨勢，則女性勞動者的環境，在客觀條件上，自然更無提高之可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之下，婦女更易成爲被壓迫的對象，非但不能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待遇，甚且根本被淘汰，被趕走，而將她們所已得的地位奉還男子。在一九三五年中，這是

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實。如在德國，政府在所有各機關裏採取了限制婦女服務的辦法，即使遇有不受淘汰的，而工資也特予減少。德國各大城市的女教員，多半都被男子所頂替。至於已婚婦女之從事賃銀勞動，是特別受了法律的限制，說是爲要減少失業人數的緣故。同時政府又施行一種利誘的方法，即規定如婦女家庭在她丈夫月入一百二十五馬克以上的時候，放棄已有職位而永不要求復職的，則由國家予以結婚貸款。後來又進一步規定在婦女領得結婚貸款後，如她丈夫不到了失業保險法所規定的需要程度時候，永遠不許重新就業。這在表面上是實行了將婦女趕回家庭的政策，而實際上卻是剝奪婦女的經濟平等。

上面是專指國社主義的德國而言，原不足使人驚異。現在若拿資本主義之王的美國來說，我們更容易明瞭一九三五年世界婦女的經濟地位了。以比較高尚的女教員職業爲例：美國女教員所擔任的工作，是與男教員一樣，而她們的薪給卻顯然是不及男教員的。而且，在結婚後，女教員更受了歧異的待遇：許多城市已經採取不聘已婚女教員的政策；在有的城市中，女教員一結婚後，即不許教書，或是已婚婦女祇許充任代課的教員。自美國受了大恐慌怒潮的襲擊後，女教員的境遇

更劣，薪俸益見低落，解僱情事更時常發生，尤其是對於結婚的女教員。至關於一般勞動的概況，羅斯福的復興政策，雖然對於若干種婦女勞動有着相當的規定，但美國勞動婦女的經濟狀況，事實上並未因此有所改善。

其它各國婦女失業之增多與就業之受限制，更是不勝枚舉的。譬如，在奧大利，對於所有各處公共機關的已婚女職員及為國家服務的工資勞動者與薪水僱員之已婚女性，也用法律明文來規定限制的辦法，即如她們的丈夫是在國家機關任職且每月收入是在某一種數目以上的，則都須一律予以解職。在意大利，其始是授權政府限制婦女從事公務員位置競爭的數目，或甚至完全不許她們從事競爭。不久後，這種辦法便由公共機關推行到私人企業。而在另一方面，法西斯蒂工業聯合會與法西斯蒂工人聯合會之間，又成立了一個協定，其中主要目標之一即為以男工來代替女工。其它如南斯拉夫，荷蘭，盧森堡，比利時等國，都先後採取了限制婦女就業的辦法。比利時政府則曾明白頒佈命令，確定每門工業中已婚或未婚婦女勞動人數的百分比，以期能夠排擠一大部份的女工，而將過剩的失業男工安插進去。

上述各種事實，都可證明在政治動向的嬗變及經濟狀況的惡化中，婦女首先做了犧牲者，從前所爭回來的經濟地位，現在一一被剝奪了。

像對於爭取婦女政治地位的問題一樣，伊斯坦部爾大會對於婦女爭取經濟地位的問題，也發出了動人的呼籲。其中主要兩點是說：（一）維持生活的權利是一切人類所應有的權利；（二）維持生活的權利，不得因性別及婚姻問題的理由而遭受剝奪。這個合理的公允的要求，也恐怕與前一個問題一樣，未必能引起反響罷。

其實，在經濟上，對婦女實施了歧異的待遇，也未必能在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裏面，發生了強有力的效益。在事實上觀察，統計表可以告訴我們說，在勞動婦女的總數裏，已婚婦女不過佔了百分之三十的比數。而在這百分之三十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不能由男性來頂替的，對於這麼少數的女性勞動者，採取了種種限制的手段，到底可使經濟恐慌問題因此稍為得到補救的辦法嗎？照這樣說，一九三五年婦女經濟地位之降落，未必是單純的基於經濟的原因，同時必然也有其政治的背景，換句話說，即全部社會問題是無從談起，婦女問題便於無形之中跟隨了這個趨向，同

爲整個世界社會未根本調整之前的若干懸案而已。

退一步說，在客觀的觀點上，婦女在經濟上鬭爭所採取的策略，也不無回頭研究之餘地。如若以與男性對敵的立場，來抵抗上述種種不公允的措置，以求達到平等待遇的地位，則在現階段的經濟組織和政治動向之下，恐怕前途層層障礙是更不容易剷除，結果總是徒勞無功的。再若同時爲時勢所屈服，而採用了競爭的方式，以接受低額工資的條件來維持婦女的職業，那就更中了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牢籠，而進一步自陷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步了。法國的勞動婦女最近有了整批的加入勞動各種組織的趨勢，她們與男工站在同樣的地位，而以此連帶關係來替代低貶工資的鬭爭，結果很得到互相維護的成效。這就是說，唯有團結的勞動組織纔能產生制止壓迫的力量。

從正面看，一九三五年的婦女地位，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幾乎普遍的遭受壓迫。然而，從反面看，也不是絕無擡頭的徵象。雖然處於眼前積極壓迫之下，有如德國婦女那樣屈服的狀態，但大體上世界婦女運動受了德國影響的總不會多，到處也不乏奮鬥的表現。土耳其的女權膨脹，便是

一個實證。就說在最反動的日本，勞動婦女也踴躍的參加民衆運動。雖然因爲日本統治者不願揭露這方面的消息，我們無從得到正確的數字來全部揭明日本覺悟婦女的活躍性，但若據片斷的記載，則在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所謂「肅反」事件而被逮捕的七百三十六人裏，就有一百三十四名的女性；日本統治者甚至認爲這是「女性參加民衆運動之空前的異常性。」日本婦女這種活動情形當然也繼續表現於一九三五年中。至在其它國家裏，婦女之參加各種社會運動，特別如反法西反戰爭的運動，都有極踴躍的表現。這種趨勢，必然要隨社會矛盾之尖銳化的程度而不斷演進。所以，眼前婦女地位的跌落，未始不是促使她們走向求解放路上的一個主要因素。

## 第五章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社會

以上各章所述一九三五年世界社會的一般狀況，是專就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國家而談的。人口一萬六千餘萬的社會主義的俄國，社會的性質是與前迥然不同，社會情形當然是完全相反的。姑不論國與國間常有彼此互相直接的或間接的影響作用，足引起我們深切的注意，即在檢討的工作上，對於這個意義深長的對照，當然也要承認其重要的地位。

近來關於討論蘇聯一般情況的著述，已是汗牛充棟了。本章祇就一九三五年關係社會生活的事實，如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演進下的社會情形，及勞動、婦女問題，分別予以敘述。

### 第一節 德謨克拉西傾向下的蘇聯社會

馬克斯主義者們認為共產主義的最後目的，是在於消滅精神勞動和勞力勞動的區別，同時



也要剷除城市與鄉村的區別。

一九三五年，在蘇聯的政治組織上，曾發生了極有意義的動向。若將這個動向和上面的話聯繫一起，那我們對於蘇聯政治生活的新面目，將有一番新的認識，同時對於蘇聯的最近社會情形，也不難明瞭了。

在蘇聯的過去憲法規定裏面，有如下特色數點：第一、是選舉權不平等，即是說，勞工與農民的選舉權利大有差別。按蘇維埃聯邦大會的憲法規定，勞工選舉人每二萬五千人中選出代表一人，農民則每十二萬五千人中亦僅選出代表一人。第二、是選舉制度採取多級制。從來，在蘇聯國內所採用的直接選舉制度，僅限於城市蘇維埃和鄉村蘇維埃。至於高級的蘇維埃機關，則不是由選舉人直接投票，而是由蘇維埃大會選舉出來：例如區執行委員會是用二級選舉制，地方執行委員會與州執行委員會以及自治共和國的行政機關，是用三級選舉制，聯邦各共和國內的州執行委員會及全蘇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上都用四級選舉制。第三、是選舉採用公開形式。這個辦法是便於迅速派遣或召還所選出的代表。歐洲一般擁護德謨克拉西主義者，對於蘇聯不許採用秘密

投票制度，常施以猛烈的非難，指為剝奪公民的政治自決權。

蘇聯憲法過去之所以採取這些選舉方式者，主要原因不外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鬭爭中，勞工與農民之間尚有着一種顯明的區別，與反革命的勢力尚未肅清，知識份子的態度尚不可靠，不得不採用這些方法，以鞏固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權。

本來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者的心目中，勞工是革命的積極份子，是應站在一切鬭爭的領導地位，是對於決定政策有直接影響的唯一份子。所以，過去專以熱心的忠誠的勞動份子來擔當統治國家的責任，作為無產階級獨裁政權的基礎。假如非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站在同一水平線上，則鮑爾雪維克的獨裁制之基本觀念將告消滅了。在第一屆五年計劃實施之前，城市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已歸絕跡，但農民的私有資本卻仍然存在。雖然農民曾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參加革命，雖然土地曾被宣佈歸為國有，但農業仍歸私人經營，他們藉自備的器械與設備，因而逐漸成為新的資本家。此所以農民有着「具了兩個靈魂」的特性：一方面固然是勞動者，它方面又居於所有者的地位，他們顯然不能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中堅份子了。這是蘇聯過去對於農民採取極

端冷淡態度的原因。

在另一方面，蘇聯的統治權，是完全交與充當無產階級之先鋒隊的共產黨；所有主要的蘇維埃委員們都是共產黨黨員，他們站在戰爭前線上，每件事都能聽黨的指揮。而共產黨的門戶從來沒有很大的公開過，無論何時，縱然允許黨外之人加入，也必需經過一段困難的試驗時期，只有那些能完成其所指定的信仰者，方有登記的希望。黨員的基礎，以及政治活動，都是採取了極端獨佔的形式。

至於多級選舉制及公開投票制，即爲對於勞工的指導權，給予促其容易進行的條件。且在社會主義政權未臻完全鞏固，及行動上需要敏捷而事件又極其煩多的時期裏，這些方式對於整個制度的運用，顯然可給與極大的方便。

到了一九三五年，蘇聯內部的情形，已截然不同於過去的時代了。自一九二九年第一屆五年計劃實行後，即有集體農場制度之出現，使農業生產方式產生了一番澈底的革命。在這種農業社會化的制度之下，土地的私有資本是歸之於公，農民經營公共的土地，按各人工作的質和量以分

受土地的產物。在集體農場與 M. T. C. (機器曳引站) 的迅速發展之下，農民現已非資本家；同時，他們由集體農場制度中，深受了鮑爾雪維克主義的感化而，且他們本身的利益也隨鮑爾雪維克政權之鞏固而逐日增加，他們再不做反社會主義的不忠實份子了。尤其是在農業社會化的實現中，不獨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的區別已經完全廢除，即工業勞動與農業勞動的彼此性質，亦已無差別可言。因為現在農民對於穀物，工業原料，牲畜等項的供給，已盡了絕大的貢獻，其成就確是不亞於工業勞動者，因此，蘇聯當局非但不否認農業勞動為工業勞動之一種，而且承認了農民在社會地位是特別重要的。在這時候，以政治權利賦予農民，才可適應農村經濟改組後之新狀態。同時，社會主義的政權，現在是到了牢不可破的地位！國內整個社會情勢已完全轉變，大眾的政治意識已有確實的充分的進步了。像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千餘名工程師及有職業者之破壞蘇維埃政權的行動，現在已絕跡不見了。雖然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尚有基洛夫 (Kilov) 暗殺案之發生，但這是屬於黨內份子的行為，範圍也未若何擴大，政府并不因此而須重新引用恐怖政策。到此，「葛杯烏」組織也有了改組的必要。在政治社會已上正軌的時候，過去所採用的多級

選舉制和公開投票制，都無繼續存在的理由與必要了。

一九三五年開始時候，蘇聯在感到牠本身發展的條件及農民方面的熱烈要求之下，發表了蘇維埃憲法必須修改的旨趣。在一九三五年二月蘇維埃聯邦會議中，莫洛托夫提議說，修改憲法給與農民以政治權利及剷除以前不平等地位的時期是到了。其後，由斯大林、伏洛希羅夫、布哈林、卡加洛維赤、拉狄克等三十一名巨頭的領導，設立一個修改憲法委員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是由斯大林於七月七日召集的。爲從事準備修改的工作，委員會下分設十二個小組委員會，一切社會問題都包羅在內；性質之重要，遠非普通各國修改憲法所可比的。無疑的，這是要通盤估計整個社會的新發展狀態，而制定一個完全適應新環境條件的基本法了。

至於蘇聯這次修改憲法的要旨，可列舉如下：第一、不平等的選舉制改爲平等的選舉制，即今後擬使農民與勞工在同數目的情形之下，選舉同數的代表出來。在這一萬六千八百萬的蘇聯人口中，有一萬萬是農民，這一萬萬農民將以六千八百萬的同等比例選舉代表。第二、將多級選舉制改爲直接選舉制，即擬將下自城市及鄉村的蘇維埃上至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間的各種蘇

維埃機關，都完全採用直接選舉法。第三、以祕密選舉制替代公開選舉制，藉使蘇維埃機關與全體勞動大眾的聯繫更見密切。

在這些修改憲法的原則中，特別是平等選舉權之被採用，是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整個結合上有着重大意義的成就。農民根據這一點，得到了參加政治的條件，可進一步與蘇維埃政權發生嚴密的關係。而在經濟上農民的地位與性質，都因農業的集團化與機械化的發展，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結果是使都市與農村的區別泯滅無存。這可以說，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建立一個緊密連鎖的工作，差不多將告完成。

從另一個事實表面，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社會演變。過去所成立的集體農業，不是歸莫斯科所派下的官吏所管理，就是為各鄉少數共產黨員所支配。到一九三五年五月，蘇聯政府通過一個新法案，那裏面規定每一個鄉村組織一個普通議事會，由多數會員負責，這個議事會即為鄉村的最高機關，握有撤銷及管理官吏的權力，而不為官吏所管理支配。像這樣減削官吏或黨員的權威的事件，在蘇聯可說是創見的。這次積極的變動，實際上是使共產黨員處於人民意志之下，換言之，

以前的強力約束制現在一變而為自由結合的局面。這若不是整個社會都有平均的發展，無論在意識上或信仰上都達到一個相當的水準，以無產階級獨裁為基礎的蘇聯，決不會產生這個傾向的。

至於精神勞動與勞力勞動的區別之消泯，也有充分的表現。過去蘇聯政府對於知識份子取得了極其冷淡和嚴酷的態度的。牠不惜以嚴刑峻法來駕馭他們。如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施於千餘名工程師和有職業者的嚴厲制裁，可為明證。但自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發表了六點主張的演說後，蘇聯對於知識份子的態度已經轉變漸使之與勞動者站在同一的地位。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知識份子在政治上的地位，不久必會增進的。

歸結一句話：到一九三五年，反抗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已經不存在，而所餘下的三種階級——勞工，農民，知識份子——間的不平等待遇，已逐漸掃除了。這是說：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因社會主義社會進入完全鞏固的階段，政治生活便隨之呈現了普遍的嚴密調整的狀態，因此開始放棄了以前歧視的特殊組織。

蘇聯之表現這個政治動態，尤其是表現於一九三五年中，格外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這個年頭恰是法西斯蒂勢力撼動世界的時候。當歐洲一般所謂德謨克拉克西備受威脅，與許多國家正在減削人民政治權利而實現獨佔的政權之際，歷來早具毀滅德謨克拉克西之決心的蘇聯，卻有那樣望各國所夢想不到的真正德謨克拉克西的最高程度上邁進的模樣。這一幅劇烈反映的圖畫，可說是一九三五年世界政治社會演變的奇觀了。

## 第二節 經濟發展下的蘇聯社會

(一) 蘇聯的計劃經濟與社會——在蘇聯國內，所有經濟生產工具，即是說，一初工業運輸，銀行，貿易的事業以及土地等等，都不歸私人而歸勞動者所有。無數萬的平民，以前是受了貧窮和壓迫的痛苦，現在一變而為新社會生活的創造者。在這種狀況下，經濟上最重要的問題，乃為建立及提高每一個勞動者的整個生活程度，及滿足每一個勞動者的物質、文化及日常需要的問題。所以，在蘇聯國內，所有各種產業的經濟活動的目的，乃在於增加經濟的效能與產生多量的貨物以



供勞動者享受。質言之，這個目的是在實現生產社會化，並由生產的發展而推進社會的發展。

在蘇聯，各種企業及企業的組合，既不用仇敵相視和互相競爭的手段，則在它方面，牠們的活動，是共同合作，是用一定的經濟計劃，以提高社會生產的水準。這種合作，必然是在集中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中而實現了。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提交共產黨大會的報告中，陳述蘇維埃經濟的利益之一，便這樣說道：「工業的發展，並不是附屬於競爭的原則及保障資本家的利益，乃是附屬於計劃統制的原則及作有系統的提高人民的物質及文化水準。」

可是，當蘇聯在實施第二屆五年計劃的時候，也有些國家，如德美兩國，同樣製定了某某種經濟計劃出來。如在美國的復興運動中，曾製定最高限度的消費計劃，以增進社會上的需求，並使生產事業恢復生氣。德國則在國社黨執政之後，立即製定一個經濟計劃，以應付當前的危機及消滅失業的現象。但結果呢？美國的生產復活，始終沒有得到穩定的狀況；在德國，則實際上失業也始終未見緩和。

這樣看來，蘇聯的經濟計劃，必然有其根本不同的性質，不像一般國家用為治療恐慌種種症

象的那些經濟計劃，蘇聯的經濟計劃乃是整個社會計劃的一重要部份，牠是純粹屬於社會經濟設計的性質。牠之能夠實施，必須具有特殊的社會背景。儘管在過去十七年中，蘇聯國內的情形逐步有了劇烈的演進，而牠的經濟政策，總是使盡所有生產工具都成社會主義化，同時按步集中經濟管理權於這種社會主義化的計劃及無產階級的統治中。在實行這種經濟計劃之前，蘇聯所具備的條件，不但是在其文化及生活程度，且是在其社會理解力及社會活動。因為牠具了這些條件，遂使教育、文化工作、科學研究及技術上應用等等，都有很大的發展。這就是蘇聯施行的社會經濟計劃的重要背景了。

明白了這個情形，我們便可知道蘇聯的經濟設計並不是純粹技術的問題，乃是整個社會主義機構所表現社會活動的方式。這可由第一屆五年計劃和第二屆五年計劃的目標明顯表示出來。第一屆五年計劃的最重要目的，可說是：用全國工業化的方法，以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所謂全國工業化者，乃包含電氣化，特別是發展那些製造生產工具的工業；另一方面重新充實農業，使工業與農業成爲社會化及提高勞動者的生活程度等。第二屆五年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由繼續不

斷的工業及農業建設，及使農業充分變成社會化方法，以發展及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盡量發展輕工業及社會化商業，結果能夠擡高勞動者生活程度，發展邊陲的工業，及培養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習慣及思想。

依照這兩次計劃的目標來說，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即同樣在努力於經濟發展當中，蘇聯所要發展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牠所要避免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及遭受資本主義經濟的箝制。所以，在實施五年計劃之前，斯大林對於建設問題，所下的定義是如下：「我們必須建造我們的經濟，達於這樣一個目的，即使我們國家不至成爲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附屬品，使我們國家不包括於資本發展的整個制度裏面，好像是一個附屬的企業一樣。我們的經濟的發展，絕不能作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企業，我們的經濟，只能作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大部份是建築在國內市場及我們的工業與我們的農民經濟。」

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成功後，蘇聯的社會已突飛猛進，我們勿須多追述了。一九三五年是第二屆五年計劃實施之第三年度，如要明晰在這實施期間中，蘇聯社會建設的進展情形，不妨先檢閱

這次計劃的設計內容。第二屆五年計劃的大體規定數字是包含如下各項：（一）在第二屆五年計劃時期，一般的投資總額，計有一百三十三億盧布，即較第一屆五年計劃多一·六倍，而輕工業的投資則增至三·六倍。（二）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工業生產品應增加百分之一一四，即在甲種重工業增加百分之九七，在乙種輕工業增加百分之一三四。（三）工業生產每年增加之比率為百分之一六·五，甲類佔百分之一四·五，乙類佔百分之一八·五。（四）消費品生產之增加，達到每個人消費之一倍。（五）在大規模工業中，工人生產力之增加，達百分之六三，零售貨物減少百分之三五。

根據蘇聯當局的意見，在第二屆五年計劃的期間，蘇聯在技術上可超過歐洲所有的國家。結果呢：「第一期改造蘇聯的工作可完成了；從此後，可以脫離資本主義經濟的隸屬，而完全保障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經濟獨立」（見蘇俄共產黨第十四屆會議）。到那時候，可如波波夫（Popov）所說的：「因國家總收入的增加與寄生階級的肅清，勞農階級的生活水準可以很迅速的提高；人民日常消費品的積蓄，到第二屆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可增加兩倍或三倍以上。」

專就上述大體規定數字上說，我們不要忽略這一點，即第二屆五年計劃的目的，除了繼續發展重工業外，是特別着重於發展輕工業的生產，是以擴大大眾的消費量與提高社會生活的水準為努力的對象。如若我們觀察在國際關係緊張，戰爭白熱化的時代，資本主義各國正拚命發展破壞工業而犧牲了消費手段的生產，獨蘇聯恰在受帝國主義包圍的戰線中，雖則一方也努力於充實社會主義祖國的武裝，同時也不忘於發展國民消費的生產，而且消費手段的工業所佔的數字，反遠超於重工業的數字，則我們又將發生何種感想呢？我們可以說，蘇聯之發展重工業的生產，絕不像其它各國那樣，藉犧牲消費手段的生產即減少大眾的物質享受而實現的。反過來說，發展社會消費生產的努力，現在唯有蘇聯是抱着這個願望，並且這個願望是在其它一切目標之上。

這樣，我們不能不承認像蘇聯所施行的經濟計劃，實行於其本部的社會背景以內，才能成為經濟進步的因素，而達到發展人類社會的途徑。

(二)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經濟發展與社會——蘇聯計劃經濟的大體，既如上述，現在應檢查在一九三五年中牠的經濟發展的程度，及這種發展影響於社會的究是如何。

在一九三五年，全世界仍陷於特種蕭條的階段中，蘇聯國民經濟的發展，卻依然整個的都達到第二屆五年計劃所定範圍的程度。以是年頭三季而論，聯邦與地方工業生產的總量，較之一九三四年頭三季，增加了百分之二〇·八；這一時期的生產手段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二三·九，日用品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一五·八。生產手段的生產的發展速度，是遠超過本年度計劃的規定，即日用品生產，雖較前者遜色，但也達到本年度計劃所定的速度。在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中，已有若干工業部門，如冶金工業，橡皮工業，魚工業，罐頭工業等等，已經先期完成了半年的計劃。特別值得我們注意者，是在各國雖藉準備戰爭或以其它手段的種種刺激仍難使工業生產上昇的時候，蘇聯一九三五年度計劃之完成，卻一季比一季增加：第一季完成了百分之二四·一，第二季完成了百分之二四·七，第三季完成了百分之二五·一到了第四季，即斯泰哈諾夫運動開始發展之後，蘇聯生產量之增加比率，當然又大大的提高。譬如探煤業的成績，在是年上半年中，是比較落後的，但自下半年起，即告恢復，到了十一月末，便把是年度的計劃完全完成。又如輕工業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即完成了預定計劃的百分之一〇二·四。食品工業是這一年特別發達的部門。

織物也開始大量的生產。此外，如鐘錶，留聲機等文化用具的生產，也有顯著的增加。輕工業這樣的發展，就是蘇聯國民生活提高的徵象。

至於農村經濟，則因集體農場制的勝利而大告成功。一九三五年是集體農場在組織上經濟上更見鞏固的時期，同時技術改造也繼續作有系統的進展。當是年開始春種之前，又有將近五十萬的農民加入了集體農場。在是年一月一日，農村經濟會擁有二十七萬八千輛耕種機，到十一月，牠共計約有三十五萬輛。是年用耕種機耕種的土地面積爲七千九百萬俄畝，而在一九三四年，祇有四千八百五十萬俄畝。因農業機械化之成功，農產品有了鉅量的增加。例如未加製造的農產品的價值，僅以一九三五年的集體農場一方面而言——國營農場不計，便爲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較之一九三四年是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這各部門生產的進展，是具有解決第二屆五年計劃的最重要任務之一的作用。大量的提高國民的物質享受的水準。有兩個確實的現象足以證實這個功效。第一，是表現於金融方面。儲蓄銀行的存款是繼續不斷的發展：在一九三五年頭五個月中，存款增至百分之七三·九。是年初本來

預定全年國家銀行應開九四六、〇〇〇顧主帳戶，而到十一月，已經開了一、一七五、〇〇〇戶，即是說，超出預定額百分之二四。照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決算，各集體農場在國家銀行存款餘額，是年計有九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較上年增加了六三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流行民間的每一個盧布，在一九三四年返還國家銀行共八次，一九三五年竟到了九十三次。這種種不但證明了工農業生產之邁進，而工農的財富增加及生活水準提高，便充分表現在那裏面了。

另一事實則表現得更明顯，即是食糧券制之於一九三五年開始廢除。在一九二九年，蘇聯施行了分派食糧制，每個人都須憑券購買麵包及其它日用品。現在工農業生產量的增加，保證了商品流通的增加。零售商品的流通量，較之上年同一時期，是增加了百分之三五·二。國家商店與合作社的商店商品流通都在增長中，而集體農場的商品也一樣的增加。人民生活狀況既臻佳境，對於食糧及日用品的需要自然隨之激增，當局也不至因食糧券限制辦法之廢除而感覺消費品不敷支配的困難。商品不受食糧券辦法的限制後，牠的流通量擴充，價格也隨之減低，因而提高了貨幣的購買力。據蘇聯物價管理局的統計，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市場物價平均減低百分之二五。



簡言之，在蘇聯經濟計劃迅速發展之下，過去貧窮的現象是一掃而空，特別是勞動大衆物質享受的提高，更鞏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

### 第三節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勞動狀況

蘇聯勞動者所處地位，與其它各國勞動者大有差異，因之，我們在檢討蘇聯勞動問題中，所注意之點也大有不同。這裏除了敘述一九三五年的勞動生活外，我們特別注重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勞動者在整個社會上所擔任的任務，及其如何發揮他們的真正能力。

(一) 一九三五年蘇聯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一九三五年，正當歐美各國仍苦於失業問題無法救濟的時候，蘇聯方面卻依然繼續在發展途中猛進。是年頭八個月中，蘇聯大工業的工人數目，比較上年同一時期，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八·一；在這八個月中，工程師及技術工作人員比上年同期增加了四萬八千人，職員增多百分之一，建築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八三；一九三五年八月份的鐵路工作人員比上年八月增多百分之一三·二。集體農場的工作人員數目，大約因機械化的

發展，在一九三五年頭七個月中祇及上年同時期的百分之九五·八，但其中也有好的方面的變動：長工數目增至百分之九·六，在季候工人與短工的數目俱見低減當中，農業的技術人員卻增至百分之二·六。

以勞動者的生活狀況而論，一九三五年蘇聯勞動者環境之改善，特別是其它各國所不可仰望的。在蘇聯，一方面則有勞工工資率之繼續增加，例如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工業方面的工資，增至百分之二〇至三〇；它方面則因消費品生產之激增，商品流通額擴大，物價有顯著的降低，勞動者的消費量又隨之提高了。一九三五年頭十個月的消費品生產，較之上年同期，有着下列幾個顯明的增加數字：如牛乳的生產量約增百分之二〇，牛油約增百分之二〇，雞蛋約增百分之六〇，水菓約增百分之三〇等等。至於物價的減低趨向，據蘇聯物價管理局的統計，在蘇聯十大城市中，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市場物價平均減低百分之二五，下列幾種日用必需品的物價低落指數，足為左證：

物 品 名 稱	一九三五年較上年減低的百分數
馬鈴薯	四九
雞蛋	二四
牛肉	三四
肉製品	三三

因爲消費品產量與勞動者的需要同時增加，故食糧券制便於一九三五年開始廢除。政府對於社會事業的經費，也巨量的增高：例如教育經費增高百分之三〇以上，衛生設備費增高百分之二〇。

過去，唯有勞工是處於國家特殊份子的地位：他們享受免費健康保險，養老金，及低廉的生命保險，他們易得儉省的甚至於免費的保養所和住所，且爲房屋分配候補單中之優先者，同時又享有入高級學校及購買低價物品的特許權。現在則因生活情形之迅速發展，足使大多數人民同享這些利益。農民因爲參加集體農場的工作而臻至勞工同等的地位。甚至知識階級份子，也可享受

同等保養所，住所，及獲得其它利益的權利。养老金及健康保險的各種制度，也將於不久後遍行於蘇維埃鄉村裏面。

總之，在一九三五年，蘇聯國內非特消滅了失業，貧窮各種社會不安定的現象，勞動者的新生活已經形成而且逐漸穩固了。蘇聯各方面設計的最終目的，是在於提高每個勞動者的整個生活水平，與滿足每個勞動者的物質，文化及日常需要。一九三五年是蘇聯全體勞動者開始真正的享受這種計劃的效果。

在十一月斯泰哈諾夫運動大會裏，斯大林於解釋這個運動的意義之下，曾說道：「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每個人盡自己的能力而工作，可是每個人所得到的，並不依照他的所需，而是依照他為社會所生產的量。在由社會主義更進一步的社會中，每個人盡其能力工作，可取得依照他的文化需要之所需，而不是依照他為社會所生產的量。這是說：把人們的技術水準和文化水準提高到相當程度，而消除了勞心與勞力的差別。」

將上述一九三五年的實際狀況和斯大林所說的話作一個對照，我們將覺得一九三五年的

蘇聯勞動情形是進展到另一個階段了。

(二)一九三五年蘇聯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奮鬥中，蘇聯勞動者必然是整個制度的支柱。所以，蘇聯的勞動情形，最引起我們注意者，不僅在勞動者享受社會生產事業發展的收穫物而已，在它方面另有一種饒有意義的現象，即是全體勞動者如何共同努力，以促進這個社會生產事業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是以自由競爭的原則來發展生產事業，勞動者徒供驅使，他們的作用，事實上是與一般機器相等的。在蘇聯，對於勞動者本身的價值與效能，則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牠是以提高勞動者本身的生產力為發展生產事業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蘇聯政府始終注意工人能率問題，發出「人才決定一切」的口號，同時並採取種種鼓勵方法，如組織「社會主義競賽」「突擊隊」等等，以求實現工人生產率之增進。此外，我們還須注意這一點，即蘇聯勞動生產力之提高，一方面固然由於國家施行了縝密的有系統的整個計劃，它方面是基於勞動者自動邁進，或自動講求使自己生產力加速增高的途徑。

第二屆五年計劃，是特別注重發展勞動生產力的。一九三五年度所造成的成績，確是可觀，多

數工業部門，都表現了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按照是年頭九個月，即斯泰哈諾夫運動尙未發展的時期，在重工業方面。每個工人的生產力，比較上年頭九個月，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一六·八；若專就是年九月份說，則比較上年九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一九·五。除煉油工業較見遜色外，差不多重工業的一切主要部門都有發展。以個別部門計，在是年五月，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採礦和採油方面，常擺動於百分之三·一，黑色金屬為百分之一九·六，有色金屬為百分之三七·八，主要的化學工業為百分之三五·七，農具工業為百分之五六·五，如此不等。在是年八個月中，森林工業的工人，每人的平均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一·九，食品工業的工人，在同一時期中，每人平均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二·五。輕工業全部的勞動生產率，雖然比較遜色，但在是年九月，也比較上年九月增加了百分之二·七。在建築工業中，勞動生產力則有更偉大的發展：在一九三五年第一季。當工資提高到百分之二·四·六的時候，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則約當百分之四〇，而成爲建築費減低的原因。在鐵道運輸工作方面，也有確實改善的證據，例如每一晝夜車箱空閒的平均數是大見減少；當車箱空閒的錯誤責任是歸顧客方面的比數有了相當增漲時，而鐵路人員方面關於空閒情事所犯的

錯誤，乃從百分之六九·四減為百分之三九·九。

在農業方面，也表現了工作效率改善的事實。如一九三五年的春耕情形，是較上年更見簡捷：春種的時間，在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已經完成，而上年則須延至六月十日。蘇維埃農場的播種情形，是比較上年好得多：在是年六月五日，已經完成了計劃的百分之九九·八，而去年同日則僅完成計劃百分之九一·二。

在社會主義社會建立穩固基礎的工作中，蘇聯勞動生產力之增高，實為生產文化儘量發達的具體表現，同時也為勞動者之儘量發揮他們固有能力而創造他們新社會福祉的表現。

可是，上述種種發展情形，還是產生於震動世界而開人類勞動史新紀元的斯泰哈諾夫運動開展之前呢。

(三) 斯泰哈諾夫運動——標榜自由競爭主義的資本主義信徒，在企圖維持現代經濟組織於生產機關的個人私有制度的社會制度之下，認為祇有他們那種典型的自由競爭，才是產生發展社會生產的個人創造的原動力。可是，在一九三五年中，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方面出現了一種

由勞動者創造出來的新生產方法——即斯泰哈諾夫的生產方法，卻給與資本主義的那種口頭禪以一個嚴厲的反證。

本來，蘇聯對於勞動者，一方面不斷的鼓勵他們增加生產效率，它方面又格外注重他們發揮其自身創造的能力。譬如，執行政府計劃的勞動者，如若發現了更完善的方法，可以由節省經費，材料，時間或改良生產的方法，而勝過政府所提出的計劃，他們即可擬具一個對案，向主管人建議，而由政府斟酌情形儘量接受。政府可藉此力求勞動者發展技術上的進步，使之養成提高工作效率的習慣。因此，優秀工人得從他的工作經驗裏，貢獻驚人的創造，贊助新社會建設之完成。斯泰哈諾夫運動，就是在這個生產者與社會生產機構密切結合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一個結晶品。

斯泰哈諾夫本是一個農家出身的礦工。他當初是一個不識之無與無學識的工人，後來在「文盲廢除班」和「坑工教授班」裏得到了意識上的進步。在蘇聯舉國努力促使第二屆五年計劃得按期完成當中，斯泰哈諾夫也同其他工人一樣，力求增進他的工作效率。在他所工作的唐巴斯礦區中，每一名工人的探掘量，每日平均祇有六噸至七噸，至多也不過十噸。在一九三五年九



月一日那天，他用他所發現的一種新的分工方法，竟然於六小時的工作中採掘了一百零二噸的煤；不久後，又增至一百七十五噸與二百二十七噸之多。不消說，他的方法經過普及採用後，上述產煤區的產量是劇烈增加了。

斯泰哈諾夫發現了這個「加速制」的生產方法後，震動了蘇聯全國。蘇聯政府特於十一月間召集一個進行這種加速制的大會，名之爲「斯泰哈諾夫大會」，來闡明這種發現的意義，及推進擴大實行這個發現。各部門工業，各處農場，甚至於各處學校的教程，都先後響應，採用斯泰哈諾夫的方法來增加牠們工作的效率。在短短一段期間中，這個運動——即稱爲斯泰哈諾夫運動，便風起雲湧的遍行於蘇聯全國，而成爲一九三五年中最引起世界注目的一件大事。

斯泰哈諾夫運動發展之後，蘇聯各部門產業的生產，立即表現巨量的增高。有若干部門，產業是比前增加了三倍至五倍。在若干煤油田裏，截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有的已把是年度的計劃全部完成，有的甚至超過了預定的產額。重工業的勞動生產效率，據康拉索夫斯基的估計，已比前增加了百分之一六·三。採煤業則因這個運動而掃除了是年上半年期的不振狀態。根據蘇聯所已

經發表的數字，在實行斯泰哈諾夫生產方法的地方，常有打破世界最高生產率的紀錄。一九三五年度之有若干部門能提前完成預定計劃者，多半是基於斯泰哈諾夫運動。

就眼前已知的情形說，斯泰哈諾夫運動對於蘇聯第二屆五年計劃是盡了偉大的貢獻。這個運動的發展，是勞動大眾取得技術上成功的表現，是蘇聯生產文化優越的確證。尤其是與在資本主義勢力支配下的勞動生產情形比較，更顯出光芒萬丈的異彩。

#### 第四節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婦女狀況

(一) 蘇聯婦女地位之演進——在托爾斯泰的傑作「地獄帝國」裏，有一個農民名做米特力赤者曾這麼說道：「鄉下婦女，這是什麼東西？是一個賤類。是盲目的畜牲。牠們什麼都不懂。一個鄉村婦女，從來什麼都沒有看見過，什麼都沒有聽見過。」這幾句話可以充分表現革命前俄國婦女在社會上的狀態與受人蔑視的情形。在法律上呢：帝俄民法第一〇七條是這樣的規定：「妻的職務為在無論那一方面都要服從她的丈夫，丈夫所發出的命令，無論大小，她都不得違犯。」在

經濟上呢：未得丈夫許可之前，妻子不得接受任何工作；從事同樣的勞動，女工所得到的報酬，往往比男工所得到的低了兩三倍。

蘇聯政府成立之後，首先完全掃除了婦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的地位。隨後因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之進展，婦女大量的參加社會事業，取得了經濟的實際平等。到了現在，世界上唯有蘇聯婦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舊社會男女間一切人爲的不平等待遇的條件。唯有在蘇聯是完全肅清了。

人爲的男女不平等既已消滅無遺，天然的男女不平等的補救辦法，當然也在蘇聯政府的注意中。所以，除了製定許多保護婦女的法律外，蘇聯政府是特別努力於完成保護婦女的設備。在實施第一屆五年計劃中，如托兒所，兒童家，母嬰博物館種種保護婦女或減輕婦女負擔的設備，及贊助婦女參加社會事業的公共宿舍公共廚房種種建設，都先後積極發展起來。此外，又因社會保險制之推進，婦女的生活保障更見鞏固了。

到了一九三五年，蘇聯的婦女狀況，自然隨整個社會建設的進展而日見提高。大體情形可由下面幾個數字表現出來。最近服務於公益事業的勞動婦女的總數，爲五、八五九、一〇〇，即幾

佔全部勞動者之三分之一。在一九二八年，各勞動大學裏，祇有百分之一五是屬女性，到一九三五年，女性所佔的比數是增至百分之三五；在職業學校裏，則由百分之二四的比數增至百分之三二。婦女受專門教育的人數增加，即為準備將來在社會事業裏擴展她們的地位。至於參加政治領導的婦女，數目也可驚人：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計有一八五名婦女，有若干名是居於人民委員或副委員的位置。參加法律方面工作的，最近計有一一三、〇〇〇名女性陪審員出席於人民法庭，其中有二〇、〇〇〇是屬於都市方面，餘下九三、〇〇〇名是在鄉村方面。

上述各種數字足與世界其他國家作一個有意義的比較；即當那些國家正在削減婦女在社會上地位的時候，蘇聯婦女卻因社會制度之差異，參加社會事業的環境之演進，繼續向健全發展途中而邁進了。

(二) 一九三五年的蘇聯婦女問題——上節所述蘇聯婦女狀況，是蘇維埃政權成立以後不斷演進的現象，在一九三五年中，不過是這個現象繼續擴展而已。若就蘇聯而論蘇聯，則在婦女方面，一九三五年尚有亟待解決的問題。

就婚姻問題上說，蘇聯法律對於結婚和離婚各種條件的規定，是非常簡單的。祇須未婚或已婚的男女雙方達到法定的十八歲年齡，彼此洞悉對方的健康情形，同意於婚姻的登記，即可取得婚姻的結合。祇須男女雙方當事人之一，向登記處宣佈取銷婚姻的願望，即可發生離婚的事實。至於夫妻之間扶養的權利與義務的關係，蘇聯婚姻法是分爲下列兩種情形而承認彼此間的扶養義務：第一、窮乏而無勞動能力的夫婦之一方，對於相對方有請求扶養的權利；第二、有勞動能力而窮乏的夫婦之一方，於無工作時（即失業），對於相對方亦有請求扶養的權利。離婚後的扶養問題，法律雖然規定雙方各可保留扶養的請求權，但祇以下列期間爲限：第一、在窮乏而無勞動能力的配偶者，對於向他方請求扶養的權利之保留，自離婚之日起不得逾一年；第二、在窮乏而有勞動能力但無工作（即失業）的配偶者，對於向他方請求扶養的權利之保留，自離婚之日起，不得逾六個月。

結婚和離婚的條件，既是那麼簡單，結婚後和離婚後所留下或有的負擔，又是相對的輕微，結果是結婚容易，離婚也容易，許多壞的現象不免由此產生，受害比較嚴重者必然是在婦女那方面，

了。

據伊士哥也夫在消息報 (Isvestia) 上所披露的報告：在一九三四年，莫斯科三百六十萬居民中，結婚登記者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一件，但是，在一九三四年一百宗結婚中，便有三十七宗以上的離婚。一九三五年頭五個月內，離婚的百分比又提高到百分之三八·三。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份，離婚事件是特別多：在四千三百八十一宗結婚中，離婚就佔了二千零四十宗。

這種離婚風氣所以成爲社會上嚴重問題的原因，我們可於伊爾夫同皮特洛夫兩作家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的真理報 (Pravda) 上所發表一篇關於「母親」的小說裏看出大概。那裏面是有着這幾句話：「結婚是一樁很隨便的事情，離婚也是一樁很簡單的事情。打開窗子說亮話，離婚比填寫一張居留證，或打聽一件消息，或將煤油運到鄉間別墅去，都容易些。離婚這樣方便，流弊就發生了，」所謂流弊者，就是許多男人，濫用國家的法律，常常換妻子，隨隨便便對待女性，完全蔑視了社會主義尊重女性的信仰。

在這種情形之下，遭受拋棄後的痛苦者，多半是女性。而國家法律所定物質補救的方法，不能

發生充分的效力。同日消息報上另登了一篇研究關於扶養問題的文章，那裏面的話可以證實這個情形。牠說：「據婦嬰保育院的調查，帶着小孩的被棄女子所得到的扶養費，爲數很是有限；在她們裏面，有百分之二〇每月扶養費沒有超過二十盧布，只有百分之一七每月扶養費是在五十盧布以上。而且，單靠法庭的判決書，往往仍不能擔保扶養費之照例支付。拋棄妻子的人們，從這個城市跑到那個城市，爲的是不用付扶養費，他們往往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們又可和別的女子結婚，因爲法律雖則禁止已婚人再結婚，但一個已婚的人和旁人發生事實上的夫妻關係，照蘇維埃聯邦最高法院解釋起來，並不當爲一種重婚行爲。」

如上所述，蘇聯婦女在婚姻問題上，仍不免處於低劣地位，做了不幸的犧牲者。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中，蘇聯社會是瀰漫着反對這種離婚行爲的空氣，輿論界極力責罵那種模型的丈夫。上述伊爾夫同皮特洛夫之關於「母親」的小說，曾在蘇聯社會發生了重大的反響。因爲報紙的宣傳，輿論的督促，政府方面很受感動。八月十一日，人民委員會議通過一條法案，對於不肯扶養自己孩子的父親將處以一年的監禁。十月二十二日，政府又決定凡單方請求離婚者，不能遽予照准。救濟離

婚問題之開展，直接是保護蘇聯新女性之物質上與道德上的地位，間接是維持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秩序。

除婚姻方面所發生的婦女問題外，還有一個戕伐婦女的嚴重問題。即打胎問題，也於一九三五年中大大引起蘇聯社會的注意。

按照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法案，婦女可以請求合法的打胎。但是，據若干醫生所發表的意見，打胎以後往往發生各種餘後症，甚至在良好的條件下施行手術，也不能免發生這些弊病。同時，因為最近在醫院裏面，對以施行合法的打胎特意增加許多麻煩，非至萬不得已時，不肯施行這種手術，由是祕密打胎在一九三五年中是特別流行。許多醫生是認為打胎行為是一個「社會的大災殃」，主張反對施行，尤其是主張嚴厲取締祕密打胎行為。因此，在這一年中，反對打胎的運動，在蘇聯大見開展。關係機關加緊了反對打胎的宣傳，許多小冊子，電影片，公開演講等等，都極力向社會說明打胎對於婦女的危險。

實則從前推動蘇聯婦女請求施行打胎手術的種種理由，現在多半是消滅了：積年以來，勞動



婦女的物質條件已大見改善，醫院及托兒所的設備都有迅速的發展。這已可大量的減少打胎行為的必要。再加以經過社會這番反對後，蘇聯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當與對於離婚問題一樣，必有進一步的救濟。

歸結說一句話，在一九三五年中，蘇聯婦女的狀況，是無論在那方面，都有明顯的繼續不輟的進展。即一般人一向所詬病的局部問題，現在也已開始尋求圓滿解決的途徑了。

## 結論

一九三五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社會，是呈現着錯綜複雜變幻百出的局面。然究其實仍不在一個基本原因的支配下：即調和社會生活是始終不可能的；上述種種糾紛的現象，無非是這個尖銳化局面的過程中日形深刻之多方面表現而已。假使我們看清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及其遭受限制的原因，則對於過去一年中的社會現象，儘管其中有着極其複雜的演變，也覺得無足深異了。

不過，這裏面有特別可注意的事實，即是一九三五年的資本主義統制下的社會，固然繼續處在因果律作用的支配下，但在程度上顯然是加速的惡化。這無疑是「圖窮匕見」表示一方的控制，矯飾的力量之已大見薄弱，它方的橫衝直撞的凌亂步驟之愈見離奇。在這種情形中，誰還能夠作調整與解決的幻夢呢？

從一九三五年已有的各種現象看，未來的社會總不免要廣續在這個趨勢中前進。社會秩序之難於維持，鬪爭的進展之無從鎮壓，終要成爲無可避免的現象。在無可如何的環境條件中，尋覓資本主義社會的出路，無疑的祇有倚賴戰神之發揮他的威力作用了。

然而，社會總是步步演進的，「剝之極，復之幾」，這個原理在歷史上已累見不爽了。無論是暴力政治的壓制，或戰爭兇殘的摧殘，都無從阻截這個趨勢。我們試回頭看，則在另一方面，有着埋頭苦幹的蘇聯廣大民衆，正着着發揚他們整個社會的力量；由事實上證明，他們顯然是達到了絕對優勢的地位。就是在暴力政治支配下的社會，處處都開始有着努力奮鬥的表現，這在社會運動者的心目中，何嘗不是前途的一線曙光。



